

西南大学记忆



◆ 名师风采

亦狂亦侠亦温文

蒋同庆自传（下）

◆ 档案拾遗

西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教授

校档中的吴宓

◆ 校史校情

记校史中的部聘教授吴宓、胡小石

1959：梁漱溟西师之行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2009年第1期

（总第2期）

刊首语

□文/蒋涛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百年西大历经风雨洗礼，迎来了又一个烂漫的春天。回顾过去的峥嵘岁月，翻开一张张泛黄的纸页，我们不禁心潮起伏：往事如烟，生命如歌。无论厚重岁月留下的满目疮痍，抑或改革开放绽放的绚丽奇葩；无论千军竞发，抑或万丈陡崖，都将永远镌刻在《西南大学记忆》的长河中。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悠悠岁月，《西南大学记忆》不断拍起银白的浪花，不断闪现金色的砾石；“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源远流长，跌宕生辉。百年办学的积淀，已然凝练成一部厚厚的历史。它倚重时间的长卷，绵延博大的教育人文，耕耘广袤的农理天地。漫长的历史华章，需要我们铭记，更需要我们借鉴与传承。古云：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记录历史，再现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是《西南大学记忆》永恒的主题。



一棵大树，历经百年风雨，仍然郁郁苍苍；一条大河，流过千年回响，依然浑厚雄壮；一座高山，屹立万年苍穹，巍然豪情万丈。这山，这水，这树，虽历尽沧桑，浩博的精神荡气回肠。西南大学的累累硕果是散播于天地间的璀璨星辰，更是传誉后世的精神瑰宝。当历史的车轮驶过难忘的 2008，时间的脚步迈入崭新的 2009，荣耀已成云烟，奋斗未有穷期。《西南大学记忆》将与西南大学人一起，带着光荣与梦想，带着使命与责任，扬帆启航！

西南大学记忆

2009年第1期(总第2期)

主办：
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丁忠民
李 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 编：潘 洵

执行主编：蒋 涛

副 主 编：胡小京

执行编辑：李亚勍

编 委：(按姓氏排序)

郝 龙 洪秋冰 刘广生

刘沐璠 齐 亮 王 娜

韦 俊

美 编：侯艳梅

校训：



目

刊首语 蒋 涛

工作动态

4 档案部门怎样进一步贯彻以人为本,建立两个体系

——在2008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摘要) 杨冬权

8 2008年档案馆工作大事记 潘 洵

名师风采

10 亦狂亦侠亦温文 孙法理

24 忆吴宓先生晚年在西南师范大学 胡国强

29 恩师吴宓先生在重庆 江家骏

31 我的自传(下) 蒋同庆

档案拾遗

34 西南大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教授名录

38 校档中的吴宓

封二、封三

校友天地

41 孟安明:在小斑马鱼里探索大世界 周襄楠

录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校史校情

- 44 西南大学寻根(之一)
——川东师范学堂与乡村师范专修科的建立 洪秋冰
- 47 人与流年共长
——记校史中的部聘教授吴宓、胡小石 王 娜
- 51 1959:梁漱溟西师之行 刘重来

蒹葭之声

- 55 吾诉吾爱 桃 子
- 57 被冷遇的石马

莘莘学子

- 58 她的存在,是一个永久的惊奇
——记2006级运动训练专业张亚雯同学 周 妮

他山之石

- 63 服务求生存,贡献求发展
——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王 娜

本刊地址: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023-68252544
13436113550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2544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编:400715
照排:海华技术服务部



档案部门怎样进一步贯彻 以人为本，建立两个体系

——在2008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摘要)

□国家档案局局长 杨冬权



所谓建立“两个体系”，即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这是我去年秋天开始提出来的。大家知道，去年夏天，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作重要讲话时，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发展要以人为本，档案工作何尝不要以人为本，档案的最大价值应该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各种需要，档案工作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为社会中最大多数人提供他们需要的档案服务。这就需要做到两点：第一点，档案资源体系应该覆盖所有被档案记载过的人，否则，有的人在档案资源中就是空白，当他需要利用有关他的档案时，档

案工作者就无法满足他的需要；第二点，档案利用体系应该方便所有想利用档案的人，否则，即使档案资源中有他想利用的档案，他的利用愿望也会落空。

刚好，在此前后，我有机会到山东、河北、浙江等地调研，看到他们或者利用民生档案服务民生，或者建立家庭档案服务千家万户，或者在城市的社区和农村的乡村两级建立广泛而且先进的档案工作网络，为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提供方便快捷的档案利用服务，使有些生活在山区的村民也能在本村、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县政府、乡政府的红头文件，看到村里头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档案。这些实践中最鲜活的东西，给了我

强烈的启发,激发了我的灵感。2007年9月5日,我在纪念档案法颁布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即席提出了要建立“两个体系”。但由于是即席发挥的,事先准备的讲稿上没有,所以发表时并没有这两句话。9月下旬,我在浙江省民生档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正式提出了建立“两个体系”这个提法。之后,在今年年初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上讲话时,我明确提出要“贯彻以人为本,建立两个体系”,并对开始时不大规范的“两个体系”的提法作了规范,即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这里的人民群众,指的是所有的城乡居民,指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既包括了官,也包括了民;既包括了市民,也包括了村民;既包括了名人,也包括了凡人,是没有身份地位之别和高低贵贱之分的。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建立“两个体系”呢?

首先,这是以人为本思想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人为本思想的提出和在实践中贯彻,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它带来社会的一系列重大转变。人成了全社会关注的中心和重点,成了发展的中心目标和重点指向。档案工作必须适应这一转变,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纳入档案工作的体系当中,并作为体系的中心,围绕人民群众这个中心来确定档案工作的终极目标,建立档案工作的各个体系,调整档案工作的发展路径。

其次,这是科学发展的形势给档案工作提出的新任务。近几年来,随着全党、全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民生问题成为党政领导关注的重点,也成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关注的焦点,而大量民生问题的解决,民生档案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把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把有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的价值,给凸显了出来。我们猛然认识到,如果没有大量有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我们根本无法为各级党政领导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以及改善民生去服务。如果说,过去,当全社会都政治挂帅的时候,档案工作体系即使远离广大人民群众,档案工作还可以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的话,那么,在今天,当全社会都以人为本、都去关注民生的时候,如果档案工作体系还远离广大人民群众,那就很难谈得上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了,档案工作就要偏离中心了。在全社会都在以人为本、注重民生,改善民生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今天,哪个部门脱离人民群众,哪个部门就脱离中心,就会被边缘化。档案

工作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如果档案工作不能以人为本,有效并及时地服务民生、服务广大人民群众,那么,不但各级领导不会重视你,而且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也会冷落你。只有着眼和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来建立档案的资源体系与利用体系,有效及时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民生,档案工作才有成绩,才见成效,才能受到重视,得到支持,才会具有活力,蓬勃发展。

再有,这是对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的新趋势的新总结。这些年,随着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和以人为本思想在社会实践中的深入贯彻,档案工作也更加关注人民群众,更加贴近人民群众。例如:在继续加强机关档案工作、国有企业档案工作、农业农村档案工作的同时,新拓展了民营企业档案工作、社区档案工作、家庭档案工作等,档案工作涉及和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再例如:档案利用突破历史文件的范畴,新开辟了已公开现行文件利用这一新的领域和“文件超市”这种新的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用现行“红头文件”打开了大门,提供了方便;又例如:开辟了送文件下乡、为社区和农村档案室建立远程利用终端等新的服务形式,使普通百姓在自家门口就能利用有关档案;还例如:在一些地方的档案利用者中,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通百姓占据多数,成为利用的主角和主体。这些趋势,都表明我国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档案利用体系在悄悄发生变化。建立“两个体系”这一想法的提出,不过是把这种趋势揭示了出来、总结了出来、提炼了出来,从而号召、推动、促进广大档案工作者共同去把握这种趋势、强化这种趋势、扩大这种趋势,从而把这种苗头性的东西变成普遍性的东西,把这种趋势性的东西变成现实性的东西。最近我读到毛主席在1945年的一次讲话,中心意思是说:领导就是预见,当你看到一些新生事物刚露头出现的时候,你就预见到它,把它捕捉到,提出来,这就是领导。为了领导,必须预见;没有预见,就谈不上领导。我希望我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应该预见到目前档案工作中新出现的这种趋势,并积极带领广大档案工作者共同去强化、推动这种趋势,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推动建立“两个体系”。还有,这是对我们过去档案工作体系中薄弱方面的新加强。在我们过去的档案资源体系中,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档案和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好多专业档案,进入不了国家的永久性档案资源中,档案资源中涉及普通人、涉及民生的内容相当薄弱。同样,在我们过去的档案利

用体系中,对怎样方便人民群众利用档案重视不够,普通群众利用档案还存在着方方面面的不便。如果用以人为本对照,来检查,这两点是我们过去的档案工作体系中明显的薄弱方面。因此,我们必须针对这两个薄弱方面来重点加强,予以弥补,建立健全适应以人为本新要求的档案工作体系,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

总之,贯彻以人为本,建立“两个体系”,是我们根据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国家科学发展的形势、我们档案工作中新的发展趋势和过去薄弱方面提出来的,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基础。这个想法提出后,全国档案界反响比较好。《中国档案报》今年就此开设了专栏,广大档案工作者积极参与讨论。今年7月上旬,中国档案学会、江苏省档案学会及苏州市档案学会共同举办了“亲民、为民、利民——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为主题的学术论坛,不少专家学者发了言。总的看,大家都是非常赞成的。那么,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具体来推动“两个体系”的建立呢?我个人有这样几点想法,在这里提出来与大家交流。

第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在档案价值上,要进一步转变重物轻人、重事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到人的档案的价值,树立“人的档案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新观念、新认识。在档案服务观念上,要进一步转变重机关团体、轻个人特别是轻普通个人的观念和认识,像重视为机关团体服务、为重点人物服务那样,重视为个人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树立“群众至上”、“人民最大”的新观念。

第二,要抓紧修改和制定有关法规。要用“以人为本”的思想,重新审视过去制定的有关档案工作法规制度,修改那些重物轻人、重事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相关规定,修改那些轻视、忽略、排斥普通人档案和不利于普通人利用档案的不合理条款,特别是要尽快修改各立档单位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确保把涉及普通人、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文件材料,列入归档范围,并延长其保管期限。这是建立“两个体系”最基本、最重要、最迫切、最具体的一件事。这件事不做好,大量涉及到普通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文件材料,根本就会被排斥在归档范围之外,压根儿就归不了档,进入不了档案,成为不了档案资源,我们的档案资源体系就覆盖不到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我们的档案资源中就是空白。做好修改文件归档范围

和保管期限表这件事,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是档案资源建设过程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一件事,因为做好这件事,就为我们做其他任何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我个人是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的。国家档案局制发的机关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我是多次逐条加以修改的。那里头就把原来许多涉及到普通人、涉及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文件材料纳入了归档范围,并延长了保管期限。前不久我看到《西安档案》杂志上,刊登了四川一位基层档案工作者的文章,这位作者是个有心人,他把这个修改后新印发的文件同过去的文件逐条进行了对照,并把不同点一一列了出来,发现新的文件体现了“以人为本”,把大量同人有关的文件材料增列进了归档范围或者延长了保管期限。这位作者说得完全正确。另外,我们要求所有中央国家机关都要重新修改本单位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并要报国家档案局审批。对所有报我局审批的各中央国家机关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我再忙,也都是逐条看,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的。我提议修改的重点,就是把所有涉及人的档案扩大进归档范围并延长其保管期限,确保我们的档案资源体系覆盖到更多的人,将来能为更多的人服务。

修改法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尽快修改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进馆范围。对于档案资源体系来说,归档范围是第一道关,它把许多文件材料排斥在机关档案资源体系之外;而进馆范围则是第二道关,它把许多机关档案排斥在档案馆之外,也就是排斥在国家永久性档案资源体系之外。因此,档案馆进馆范围也很重要。如果进馆范围不包括许多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档案,那么,我们国家的永久性档案资源体系也覆盖不了广大人民群众,将来档案馆为人民群众服务又会成为空话。因此,各级各类档案馆都要抓紧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修改自己的进馆范围,切实重视人的档案的价值,注意把人的档案、把有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档案接收进馆。

总之,一个机关文件归档范围,一个档案进馆范围,这两个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方面最基本、最重要、最具体的文件,要抓紧修改。

在档案利用体系建设方面,要修改有关档案利用规定,注意保障普通群众利用档案的权利,尽量为人民群众利用可以利用的档案提供方便。当然,其他的法规制度中,凡是不符合以人为本思想,不利于“两个

体系”建设的内容,都要抓紧逐步修改。

第三,要重视过去已形成档案中民生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在过去已形成的档案中,有不少专业档案含有大量的民生信息,与改善民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权益息息相关。如户籍档案、婚姻档案、干部职工人事档案、人口普查档案、知青档案、军转人员档案、土地承包与流转档案、林权档案、移民档案、土地征用拆迁档案、房地产档案、就业档案、医疗档案、保险档案、计划生育档案、学籍档案等等。但是,这些涉及人的档案过去有些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我们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应该重视这些档案的价值,加强对这些档案资源的整合,优先整理这些档案,优先把它们数字化、信息化,优先开发利用这些档案。

第四,要时刻关注并重视新形成的民生档案。要密切关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善民生方面出台的新政策、采取的新措施、开辟的新领域、开展的新工作,为这些新领域的工作及时建档,及时把各种新形成的与人民群众有关的各类档案建立起来、收集起来,把它们列入归档范围、收集范围、进馆范围,纳入档案资源体系。例如,对近年新形成的新型合作医疗档案、就业培训档案、居民健康档案、民情档案、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档案、新型服务性组织档案、新型劳资关系档案、社会保障档案、民营企业档案等,我们档案部门就应该及时跟踪,指导建档。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等新要求。各级档案部门应该积极介入,主动服务,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中心、林权改革单位以及农民自己,及时建立农业合作、土地流转、山林权益等方面的档案。

第五,要眼光向下,重心下沉,注重做好基层档案工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乡镇、村形成的档案,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关,广大人民群众更多的是需要利用这些单位的档案,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这些单位的档案工作,把基层档案工作夯实。要指导并督促他们制定好本单位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确保所有涉民档案得到归档收集,不再散失在档案资源体系之外;同时,还要督促帮助他们保管好、利用好这些档案,及时有效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做好基层单位档案工作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一要把档案工

作的网络延伸到所有的立档单位;二要把各单位的归档范围覆盖到所有应归档的文件材料;三要让立档单位的服务满足所有需要利用其档案的人。

第六,要创新工作手段,改进服务形式。去年以来,浙江省档案局主动在一些地方帮助县、乡领导建立“民情档案”,受到基层领导的欢迎,也受到媒体的关注。这种积极主动的服务形式,是档案部门服务科学发展、建立“两个体系”的很好形式和有效抓手,对于发挥档案自身价值、提高档案部门地位、扩大档案工作影响,都有显著的作用。与之相似的是此前青岛市档案局主动与民政部门开发“社区一点通”档案软件,在全市各个社区统一推广使用,也是档案部门服务科学发展、建立“两个体系”的很好形式。另外,有些档案部门开展“送红头文件下乡”活动,把地市级和县级党委政府有关民生方面的可公开现行文件及相关档案,或者复印分送到各社区和各乡镇村档案室,或者通过网络终端传送到各社区和各乡镇村档案室,使普通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上级红头文件,享受利用档案的便利。还有的档案部门,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把已公开现行文件及有关档案,通过有线电视网,传送进千家万户,普通百姓可以足不出户,通过遥控器点击电视频道来利用档案。还有的档案部门,把相关档案信息通过手机短信进行发送,使普通百姓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档案信息。所有这些都是档案工作手段的创新,都是档案服务形式的创新。今天,科技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已经为档案部门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可供多种选择的技术手段,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尽快推动通过计算机网络、手机网络、有线电视网络等现成的先进手段,借助其他部门在社区和农村已经建好的各种网络平台,上载档案内容,开发档案信息,尽快建立起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

第七,要推进家庭档案工作。近几年,一些地方档案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家庭档案工作,为有建档需要和建档条件的家庭建立家庭档案,这是档案部门建立“两个体系”的又一很好的工作形式和抓手。各地档案部门和广大档案工作者应该积极仿效这一做法,大力推进家庭建档工作,让档案工作走进千家万户,让档案资源体系和利用体系覆盖千家万户。

(责任编辑:刘广生)

2008 年档案馆工作大事记

□文/潘 洵

1 年初,档案馆组织由纪检、国资、财务、审计、档案等部门组成的档案鉴定销毁工作小组,对 80 年代的财会档案 3125 卷(北区 1853 卷、南区 1272 卷)逐卷进行了审核鉴定,并于年底送往指定地点进行了销毁。

2 4 月 30 日,档案馆领导换届,潘洵、蒋涛分别担任档案馆正、副馆长。

3 5 月下旬,健全内部机构设置,在档案馆内部建立了收集指导科、保管利用科和编研展览科。并根据档案馆实际情况,对工作职责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

4 6 月 17 日,重庆市高教学会档案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在学校档案馆召开。

5 6 月底,对全校 2008 届毕业生集体合影照片进行了归档,这是学校合校后首次对全校毕业生集体合影照片进行规范归档。

6 7 月初,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档案馆主动提出并实施编辑《西南大学改革开放 30 周年纪事》,到年底已完成初稿 32 万字。

7 7 月初,公开向社会征集校史资料和实物,发布了《关于征集校史资料及文物的通知》,征集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名册、毕业证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毕业证书、袁隆平与大学同学合影等珍贵资料 1000 余件。

8 9 月初,组织档案馆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 2008 年教育部 27 号令颁布的《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

9 10 月 16 日,重庆市教委召开了重庆教育史志工作会议,蒋涛副馆长代表学校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此后多所重庆高校来学校档案馆学习交流。

10 10 月 27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并通过了档案馆提出的《西南大学校史文化建设工程实施意见》,正式启动校史校志编研、校史校情展示、校史校情教育、校史资料征集和校史文化产品开发共五大项目 15 个小项工作。

11 10 月 28 日,接待杰出校友袁隆平院士参观校史展览馆,并根据档案馆馆藏档案编辑了《袁隆平院士与母校》精美纪念像册和光盘赠送给袁隆平院士。本年度还组织 2008 级新生 6000 余人参观校史展览馆。

12 11 月,档案馆主编的宣传和学习档案与校史的刊物《西南大学记忆》创刊。开辟工作动态、焦点回述、校史校情、名师风采、校友天地、档案拾遗、光影瞬间、西大日志等栏目。

13 12 月,建立了教授业务材料归档制度,规定了教授业务材料的归档范围、整理移交和保存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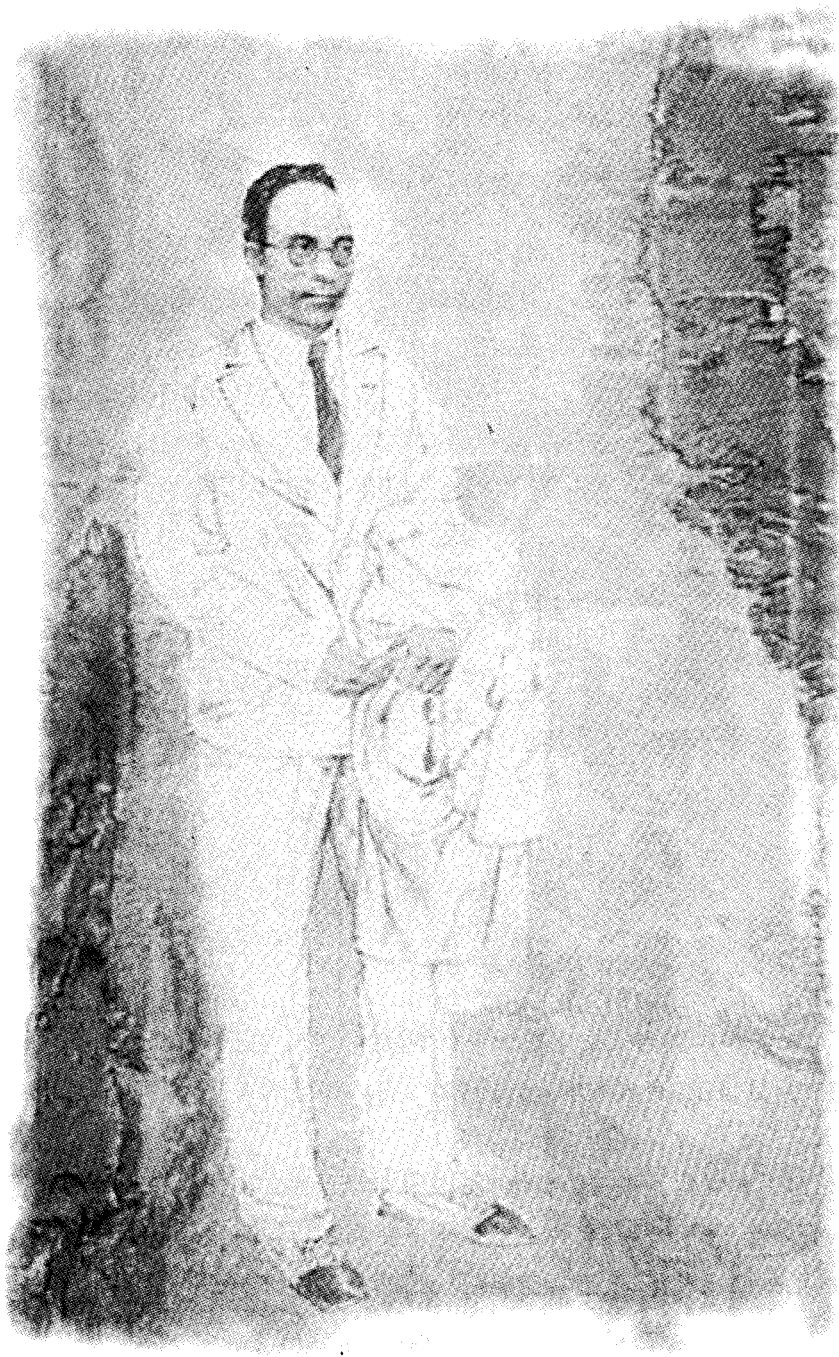
14 12 月,建立健全全校档案工作网络,确定各单位档案工作负责人和兼职档案员,并首次将学院和独立研究机构纳入学校档案工作网络。

15 根据学校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需要,为实现南北校区人事档案库房的合并和集中管理,对人事档案库房进行了密集架改造,同时对北区综合档案库房已无法使用的密集架进行了改造,更换了面板和底座。

16 广泛查阅档案,修订完成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对过去校史沿革表述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并补充完善了若干内容。

(责任编辑:刘广生)

吴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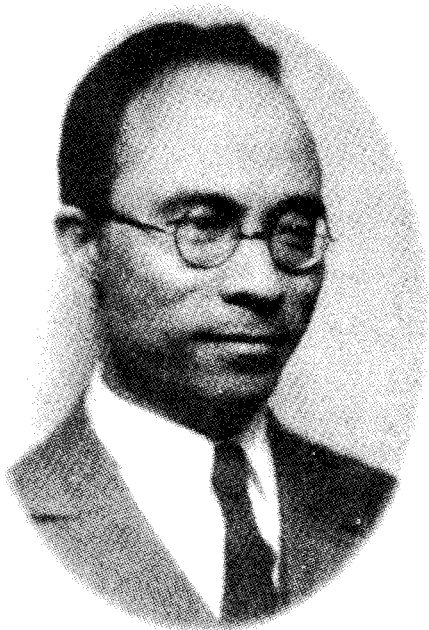
吴宓画像

编者按：吴宓，1894年出生于陕西泾阳，1917年由清华学堂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哈佛期间曾师从著名学者白璧德并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高校教授。他毕生追求“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倡导“博雅”教育。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与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成为著名的“学衡”派的领军人物。1949年，吴宓先生西飞重庆，在本校执教近三十年，先后担任过外语系、历史系、中文系3个系的教授。

本期《名师风采》栏目收录吴宓在我校的学生与同事回忆、研究吴宓的相关文章共3篇。其中，孙法理教授，系吴宓先生的学生；胡国强教授，曾与吴宓先生共事；江家骏教授，系吴宓的学生兼助手。

亦狂亦侠亦温文

□文/孙法理



吴 宓

不是人前苦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
送我情如岭上云。

——
龚自珍

想为吴宓写个小传已有两三年。吴宓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历史功过上，有人说他是老顽固，有人说他是先驱；在立身处世上，有人说他是一清如水，有人泼他满身脏污。我只想用事实说明吴宓的一生，还他一个公道。

吴宓曾引用 M·安诺德的一段话赠人：“文化比机械更有远见。文化憎厌仇恨。文化具有一种伟大的热情，即追求温馨与光明的热情。它甚至还有一种更伟大的热情——使温馨与光明盛行。”但是吴宓的一生却如他自己描述 M·安诺德的话：“曲高和寡，守道行志，终身孤独。”这种情况在他晚年尤为明显，他总是律己极严，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别人，在任何横逆面前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并以之谆谆地教诲别人。却因这样“守道行志”而“曲高和寡”，遭到种种误解、曲解、嘲弄、刁难，甚至诽谤、诬陷、打击，踽踽独行，走完了他凄凉的路。

一 清华学堂和两吴生友谊

吴宓 1894 年 8 月 20 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的安吴堡,原名玉衡,后改陀曼。1910 年投考清华学堂时自己改名宓,原字雨生,后改为雨僧。

1906 年,他考入三原县宏道高等学堂中学部。他身体不好,但体操教师要求很严,所以他曾作诗说:“队中独叹吾身弱,他日奚为军国民”。以后在清华学堂时也曾因体育不及格补考。但老来却精神矍铄,健步如飞。入校后他跟他的表兄胡文豹(与泰国永安堂的老板胡文豹是两个人)一起创办了《陕西杂志》,发表了“叙日俄战史”小说。第二年他又写了剧本《陕西梦传奇》,主角叫“泾阳吴生”。两部少年之作都反映了吴宓对国家“黑酣醉梦,哀秦庭之无人”的隐忧。

1910 年吴宓考入北京“游美肄业馆”(后改清华学堂),为“留美第二格生”(即留美预备生)。1911 年游美肄业馆开学。同学中有他后来的至友吴芳吉,后来的《学衡》杂志发起人梅光迪、汤用彤、后来的词人刘永济、国学家刘朴和戏剧家洪琛等。

1915 年吴宓与汤用彤等人成立“天人学会”,其章程说:“欲以我辈为起点,造成一种光明磊落,仁心侠骨之品格。”“天人学会”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却说明了吴宓等人的志向。“光明磊落,仁心侠骨”八字也正是吴宓品格的写照。

吴宓成绩优秀,考入清华时为第二名。入校后更为活跃,做过班长、《清华学报》编辑及代理总编辑。毕业留校后又做过《清华周刊》顾问部顾问,在该刊上发表过《二城新事》、《余生随笔》等作品。在清华的 6 年间,他在黄节(晦闻)、饶麓樵、姚茫父和他的姑丈陈伯澜等名家指导下继续写诗,诗艺渐臻成熟。因为写诗,他发展了与白屋诗人吴芳吉长达三代的友谊。

1911 年 9 月清华学堂发生了风潮。一个四川籍学生因为考试成绩与学校发生冲突,进而引起同学们对学校的不满,推举了吴宓、吴芳吉等人为学生代表与学校交涉。后来代表们了解了事情真相,决定不采取与学校对立的态度。惟吴芳吉不肯和解,终被开除。吴宓为

此终身为吴芳吉感到惋惜,多年后仍表示遗憾。

吴芳吉离校后到了天津,住在四川会馆。同学们捐了一笔钱由吴宓送去,作为他回老家四川江津的路费。吴芳吉先是不肯接受,经过吴宓劝说才收下了。随即动身返川,来到湖北宜昌却遇见一个四川老乡滞留在那里,全家陷于绝境。吴芳吉便把身上余款全数送给了他,自己去作纤夫,上溯三峡,行程 2000 里,回到江津。在疏财仗义、急人之急的态度上两吴生是全然一样的。

吴芳吉说:“吾不知诗也,吾知诗家门雨僧兄所教也”。这不全是谦辞。吴芳吉认真写诗是在吴宓帮助下开始的。两人分手以后更是经常通信,互校诗稿,切磋诗艺。他的诗才备受吴宓推崇,诗艺精进,一曲《婉容辞》当时蜀中学子皆能背诵。

1927 年吴佩孚部将进攻西安,遭到抵抗,围城 230 余日,城内生活苦不堪言。这时吴芳吉正在城内西北大学任教,兵荒马乱,生死未卜。时吴宓的嗣父吴仲旗任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秘书长,吴急告父此事,围解之后吴仲旗立即找到吴芳吉,予以帮助。吴宓亦返西安省父,把吴芳吉接到北平休养,并将自己的《泾阳吴生诗集》请吴芳吉点勘。两人商量好把它与吴芳吉的《白屋吴生诗集》合并为《两吴生集》出版。已请柳诒徵作了序,后因故未得刊行。

吴芳吉家境清贫,吴宓多方照顾,且经常汇款接济。1932 年吴芳吉病逝重庆,年才 36 岁。吴宓非常悲痛,作诗挽悼,又发表《吴芳吉传》以为纪念。吴芳吉死后妻病子幼,吴宓长期汇款接济。1957 年至 1961 年,吴芳吉的孙女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读书,吴宓也经常照顾,并按月给她零用钱。吴芳吉之子吴汉骧也经常从江津来西南师范学院看他。两吴生的忠诚友谊长达三代之久,至今两家之间情深谊笃,传为佳话。

1949 年吴宓从武汉到重庆。那年冬天他还煞费辛苦地为纪念吴芳吉而创办的“白屋文学院”上过课,此事下面还要提到。

二 留学时期

1917年吴宓到美国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大学,后经梅光迪推荐转学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就读。他的老师就是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白璧德(Irving Babbi, 1865-1933)和穆尔(Paul Elmer More, 1864-1937)。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欧美文学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达尔文的遗传学说促进了自然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打开了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这些新的观点和人们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逆反心理哺育了许多新的流派。象征主义、意象派、未来派、前卫派、超现实主义……层出不穷,各领风骚一时。总之是对19世纪主流文学的否定。

以白璧德和穆尔为首的新人文主义派却是对上述否定的再否定。他们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认为人非神也非动物;人类的根本经验非宗教感情也非动物本能,而是社会伦理。主张按普通的价值观有区别地、和谐地培养人性的各个方面。他们的价值观是超脱具体社会的普遍的伦理原则的内心制约。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依靠理智的毅力克服低级的本能,净化情操,完美道德。吴宓说人本性中有“卑下之部分”和“高尚之部分”,“东西古今凡创造宗教及提倡人文道德者皆洞见此二者之分别,以其二牵制其一”,便是对这一问题的简要概括,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十分契合。

吴宓终身奉行新人文主义,十分注意培养高尚的情操和品德。他曾说过:“我的一生言行都合于孔子、佛陀、苏格拉底和耶稣的教导。”他的文学批评也遵循新人文主义的准则。

吴宓赴美两年后,北平爆发了五四运动。与吴宓同宿舍的尹寰枢作了中国国防会副会长,吴宓便凭了一腔爱国热忱自动去协助他作了大量工作。他们打电报到巴黎和会反对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在美国报纸



吴宓青年时的照片

上发表文章阐明他们的观点,争取舆论界的支持,非常忙碌。

这年华北出现了严重水灾,吴宓将节省下来的全部奖学金悉数寄回国救济灾民。

1920年吴宓在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吴宓作过几次学术讲演,其中《〈红楼梦〉新论》很受白璧德的称赞。后来他把讲稿整理为文,发表在上海的《民心周报》上。这是他研究红学的滥觞。

吴宓在美国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到哈佛来学梵文和希腊文的陈寅恪和后来以新诗著名的徐志摩。陈寅恪是个奇才,不但通英、法、德、西等国文字而且通蒙古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甚至一些中亚已“死亡”的文字。吴宓曾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当时吴宓、陈寅恪和汤用彤有“哈佛三杰”之称。

三 清华国学院和清华外文系

吴宓 1921 年从哈佛回国,时年 27 岁。先在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作教授,讲授“中西诗之比较”、“欧洲文学史”。在那里他和梅光迪、汤用彤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吴宓任总编辑。1924 年吴宓赴奉天(沈阳)东北大学外文系作教授。

1925 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大学。吴宓回到母校,应校长曹云祥之请,主持国学研究院工作。1926 年 2 月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作教授。以后又陆续开了“古希腊罗文学”、“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诗人”以及大一、大二英语等课。后又为外文系研究部开了“翻译术”。1930 年清华给了他一年研究假,并出资送他赴欧洲游学。他在牛津大学研究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访问了雪莱遗迹、莎士比亚和司各特故居等地。第二年他赴法国巴黎入法语学校学习,再入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其间他又利用春假访问了意大利、瑞士、德国的一些名胜古迹。

在清华外文系期间他曾多次代理外文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南下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

从留美回国到抗日战争爆发的 17 年是吴宓事业上最有成就的时期。他主持了清华国学院,又为清华外文系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创办了《学衡》杂志,任总编辑 11 年,又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 6 年。还出版了《吴宓诗集》,在教育工作和学术工作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吴宓 1925 年回清华时清华正处在改大热潮中。校长聘他担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部的筹委会主任,这年吴宓才 31 岁。接受任务之后他便怀着高标准理想开始了工作,在国学部(后改国学研究院)的筹备会上吴宓提出,要培养既精通西方文化又透彻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俾能适应当时新旧交替的国情的需要,其具体目标则是:(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

关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据传冯友兰说过这样一句话:“雨僧的一大贡献就是筹办了国学研究院,并把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请到清华任导师。”这

话前半部分不错,后半部分有些笼统。事实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都是清华当局事先决定延聘再由吴宓作具体工作的。只有陈寅恪的聘请是吴宓一力保荐的结果。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后校方有意让王国维任院长,王固辞;又属意吴宓,吴亦不就,最后接受一个主任名义,却总说自己不过是“执行秘书”,表现他淡于名利、功成不居的性格。

吴宓为研究院制定的研究方法,为导师按专长开课与学生按志趣研究相结合。研究室陈列大量重要参考书籍,供师生使用。学生除了听课还可以在研究室进行研究,跟老师讨论问题。

王国维讲授的《古史新证》后来整理成专著印行,他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纸上证据与出土证据互相参证)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郭沫若称他是“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讲授的“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融汇中西治学方法,有“严正精审、密不透风”之誉。赵元任结合教学研究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专著和论证,他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就奠基于此时。而陈寅恪则在敦煌藏经洞文物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敦煌学”之名就是他此时提出来的。

学生们在这些大师们的指导和熏陶下成长很快。我国目前许多大名鼎鼎的国学家如徐中舒、方壮猷、刘盼遂、高亨、吴其昌、姜亮夫、陆侃如、王力等都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学生。

国学院成立之后吴宓辞去了职务,1926 年起在清华西洋文学系作教授,兼大学部国文系主任(至 1928 年止)。这时正值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休假,校方请吴宓暂代系主任职务。所以清华外文系的办系方针和课程设置最初都是由吴宓拟定的。

吴宓拟定的清华外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一)博雅之士;(二)了解西方文明之精神;(三)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熟谙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四)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五)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总之,他希望培养的人是足以承担文化交流任务,

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博(知识渊博)雅(品味、志趣高雅)之士。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吴宓又制定了课程表,分时代与文体开设了课程,并要求学生学习哲学、中国文学和西洋史。我国当代许多出色的学者和文化人都是按这个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如近年来以游戏笔墨《围城》轰动了寻常百姓,又以《谈艺录》、《管锥编》轰动了学术界的钱钟书;研究德国文学的田德望、从事戏剧的万家宝(曹禺)、张骏祥,从事新闻也写诗的胡鼎声(胡乔木),和英语界的李赋宁、王佐良、许国璋等。曾作过教育部长的蒋南翔是中文系的,也曾听过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课。除此之外,清华外文系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大学,在教育岗位上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

从吴宓在国学院和外文系的办学方针和办学效果看,他一直坚持的是融汇中外文化的精华,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化的方向,而且卓有成效,贡献巨大,完全不是抱残守缺的“老顽固”,更不是数典忘祖的“洋买办”。多少

年来许多人给他扣这两顶帽子,不过是人云亦云自己也不知所云而已。

作为教师,吴宓既很渊博又极刻苦。当时的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曾为文说他“像钟表般守时,像奴隶船上的划船苦工一样辛苦地备课。讲课时引用书上的原文,别人也许翻开本子照念,他却不管篇幅多长一律背诵。阐述任何问题他都是‘第一……第二……’,条理清晰,活像是一位教官在训练士兵,有点干巴,但绝不空泛。”此话得其神韵。作为吴宓的弟子,笔者是深知他那踏实严谨、一丝不苟的教学的,只是说他干巴则未必。许多时候他也很幽默,而恰好是因这幽默他还吃过许多苦头。

吴宓有时会大发脾气,但一般是很和蔼的。他喜欢帮助人,跟学生也处得很融洽。他那“藤影荷声之馆”(他在清华的住处)常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师生们切磋学术的地方。

四 《学衡》与《大公报·文艺副刊》

吴宓 1921 年在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授,1922 年 1 月 1 日由梅光迪发起的,以柳诒徵、吴宓、汤用彤、胡先骕等人为主要撰稿人的《学衡》杂志就出版了。

《学衡》产生于梅光迪和胡适的一场争论。梅和胡原是好友,留美时梅在哈佛,胡在哥伦比亚。梅主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胡主张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两人有过激烈的争辩。梅对胡在五卅运动中提出的一些见解很不以为然。他和吴宓、汤用彤等人创办《学衡》就是准备和胡适当面锣对面鼓辩论出个是非黑白来的。吴宓从一开始就是《学衡》的总编辑,以后他虽然离开南京到了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却仍然做着这个工作。

开头的 5 年(1922 年—1926 年)《学衡》的出版也像吴宓的性格一样“钟表般地准时”。每月一期,5 年 60 期,一期不漏。以后便因种种干扰出得零落了,7 年只出了 19 期,出完第 79 期吴宓被迫把总编辑职务交给了缪凤林,第 80 期却从此没有出现。

《学衡》诸人写文章没有稿费,还要出资维持刊物

出版,可见它实际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进行学术论争的刊物。《学衡》诸人认为历史有变有常。常就是经过历史考验而积累的真理,它万古常新,适用于全球。因此,他们提出的《学衡》的宗旨便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追求的真理既非复古也非欧化,不是胡适派的“弃旧图新”,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而是立足中国,吸取外国文化的长处,创造自己的新文化,从而“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变化中,他们持较为冷静的、分析的、实验的态度。吴宓说:“其必须解放必须改变乃人人所承认,适可而止之义亦众意僉同;然其所谓可、所谓最适宜之程度则国中新旧各派作者千类万殊……孰为得当今难遽断,且看后来。”总之,孰为得当要让历史发展来说明。

历史证明了什么呢?《学衡》认为“最适宜之程度”并不适宜,历史走得比他们的限度远得多。《学衡》所提倡的梁启超式的浅近文言文也没有被接受,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取得了胜利。但《学衡》仍有它的功劳。它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介绍了许多优秀的、经典

的西方名著,扶植了一些学术人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出过不应忽略的贡献。它反对把“孔家店”一概打倒,反对“把全部国学全部文言文都送到垃圾箱里去”,对于那些过激之论也是一种抑制。遗憾的是,若干年来《学衡》反对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过失总叫人念念不忘,而它的贡献却被忽视,被忘记了。

《学衡》共办了11年。主体是通论、述学和文苑三栏,其余是书评、杂缀、附录和插图。后四者加起来也不占多少篇幅。

通论栏主要刊载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论文。撰稿者大多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如王国维、柳诒徵、汤用彤、刘永济等。柳诒徵的《中国文学史》被钱穆誉为“名世之作”,刚在《学衡》发表就有书商偷印发售。王国维在古代史、金石、考古、敦煌学等方面的论著,汤用彤对印度哲学与中国佛学史方面的论著,刘永济在中国文学方面的论著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述学栏的撰稿人大都是留学西方深通西方文化而又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的学者,如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张荫麟、汤用彤、郭斌和等。他们大量介绍了从古希腊罗马到当代的欧美文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化研究和翻译。如有关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比较论述,中西文学的比较论述,都是我国最早比较文化研究的成果。郭斌和和景昌极从希腊文原文翻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向达和夏崇璞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全书,汤用彤译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等许多重要著作最初都是在《学衡》上发表的。这些经典性著作的翻译体现了《学衡》诸人,特别是总编辑吴宓,对介绍西方文化的慎重的、力求准确的态度。

文苑栏介绍了大量的西方作家,如但丁、雨果、歌德、拜伦、雪莱、济慈、兰姆、安诺德、罗色蒂、萨克雷、爱伦坡等,让中国读者了解了群星灿烂的西方作家群。它还发表了不少文言文文学创作,特别是古体诗词。其中如黄节、赵熙、吴芳吉、邵祖平等人的作品都有很高的造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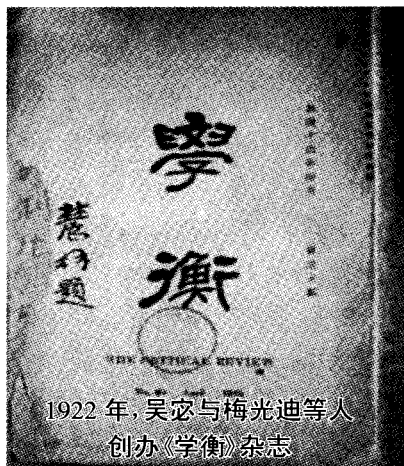
作为《学衡》的总编辑,吴宓工作得像“奴隶船上的划船苦工那样辛苦”。他自述说:“夕勤劳,至于梦中吃

语,犹为职务述说辩论”。除了编辑他还写了大量文章在《学衡》发表,计共42篇之多,如《英诗浅释》、《但丁〈神曲〉通论》、《诗学总论》等。他用了大量的精力修改来稿,特别是翻译稿。改得非常认真,更动之处常达60%—70%。向达、景昌极、邵祖平、缪凤林等撰稿人当时都还是东南大学的学生,他们就是这样在吴宓的扶掖下踏出了学术工作的最初几步的。

到1926年底,《学衡》月刊已一期不漏准时出版了5年共60期。1927年却因故一期也没出。1928年吴宓应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邀,作了该报文学副刊的主编,从此工作重心移到了新的岗位,《学衡》就出得零落了。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又发扬了他那种“像钟表般准时”的工作态度,从1928年1月2日起到1934年1月1日止整整6年,每周一期,一共出了313期,一期不漏,然后交给了后续的沈从文。《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内容有专论、中外新书评价、学术文化信息、中外古今文化名人诞辰或忌辰纪念论文等,也发表文学创作。

吴宓接受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辑的新文学作品,约了朱自清、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毕树堂等人为长期撰稿人。吴宓在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马勒尔白逝世三百周年纪念》、《诗韵问题之我见》、《吴芳吉传》等。

爱国主义一直是吴宓性格的一个特点。他在《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爱国诗歌,而且加按语说,“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此诚不幸中之幸事……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并把此诗加注发给清华学生阅读。他在刊登李鹤(太玄)的“军中杂诗”10余首时加按语说,“军人感慨悲歌,有此志气,固可心喜”。他对从东北流亡来的青年诗人王荫南的态度更能说明他的爱国激情。1933年底,他接到王荫南投寄的“癸酉咏怀50首”,为诗中的爱国热情所激动。这时他已编好他所经手的最后一期《文学副刊》,下一期即将由沈从文主编。但他仍毅然决定把王荫南的爱国诗篇50首全部编入,抽出一大部分稿件准备自己去向沈从文和撰稿人交代。他又去信约王在西山郊游纵谈,晚上送王往返处后自己才回清华。“七七”事变后王荫南竟被日本特工逮捕,死于酷刑之下,可见他的爱国诗篇



感人之深。王后来被迫认为烈士。吴宓在 1944 年才知他的死讯，曾撰文追悼。

吴宓在这一时期对白话文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吴宓是以反对白话文出名并长期受到批评的。他初办《学衡》时的确说过“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白话诗绝不可做”之类的话，而且态度很鲜明。许多人称他“老顽固”也就是根据这一点。其实，在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吴宓对白话文的态度已经跟《学衡》早期不同。这个变化见诸行动却不见诸言论，所以不为人注意。

早在吴宓 14 岁编《陕西杂志》时他就主张“文言白话并用”，可见他早年并不拘泥于文言。他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大为赞赏的《红楼梦》是白话文学作品。他学贯中西，对意大利也曾有过的文言白话之争的历史是了解的。他在武汉大学教文学批评课时曾为我们选讲了但丁的“论俗语”，让我们明白但丁为什么把经过提炼的民家语言称为“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和法庭的”语言。只是他所提倡的那种梁启超式的浅近文言，他觉得已经管用，而实际上不受欢迎而已。他接手《大公报·文学副刊》，并请朱自清编辑白话文稿件，就说明他已承认了白话文的地位。他自己审阅的白话文稿件，他也用白话文修改、改写。若是用白话文写的，如《大公报》兼办的《国闻周报》每期的文艺译稿都是白话文，请他修改，他也使用白话文。吴宓甚至自己也写白话作品在林语堂的刊物上发表，因此，还受到《学衡》同人的指责。现已出版的《吴宓诗集》里就有他三首用白话文翻译的英语诗。一首是他用文言译过的《牛津古尖塔》，两首是雪莱的长诗（Epi-psychidion 中的片断（两个小节）和

Married Lovers 三个小节）。吴宓的《空轩诗话》第 40 节引用了常乃德论新诗作品的诗，说胡适的《尝试集》“论虽可取诗不似”（请注意“论虽可取”这四个字）；说康白情的《草儿》胜过俞平伯的《冬夜》，“颇近自然吾所喜”；说“小诗独步有冰心，或谓‘繁星’过‘春水’”；说“沫若挺出颇尚气意欲雄肆力不企”等等。并认为常的这些评论是“议论正大”。可见他过去对白话文学作品的反对态度这时已有所改变，开始阅读并欣赏了。吴宓也曾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过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认为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白话文学作品。只见他并不囿于门户之见。

最值得玩味的是他对徐志摩的新诗的态度。吴宓说徐志摩的诗是“新材料—新格律”一类（吴说自己的诗是“新材料—旧格律”一类），又说徐若不是因飞机失事盛年猝逝是可以写作但丁式的鸿篇巨制的。可见他此时已承认白话诗也可成为不朽之作。

凡此种种都说明吴宓到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已不反对白话文，甚至还对白话文抱了很高的希望。可惜这一变化长期为人所忽视。

还有，吴宓和《学衡》诸人的“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通读”之说也有它正确的一面，“五四”的某些口号提得过激，有“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的意思，口号本身并不准确；而吴宓等人的反对则显然是担心“真理跨前一步就是谬误”。学术之争是应当按真理越辩越明的态度对待的。胜者固可敬，败者亦应当受到尊重。因为在相互辩难之中，彼此都会吸收对方合理的成分以改进自己的论点的。总之，吴宓不但在其他方面贡献很大，就是在对待白话文的态度上也并非一无是处。

五 《吴宓诗集》和“狂生吴宓”

1933 年吴宓在同一年内先后结束了《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两项编辑工作，次年即开始编辑《吴宓诗集》，此书 1935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吴宓平生有两个志愿：一是出一部诗集；一是写一部小说。小说定名为《新旧奇缘》，但这部小说并未写成。他的诗集倒是顺利出版了。

《吴宓诗集》分为 13 卷：故园集、清华集（上）、清华集（下）、美洲集、金陵集、辽东集、京国集（上）、西征杂

诗、京国集（下）、南游杂诗、故都集（上）、欧游杂诗、故都集（下）。各集都以他当时的住地或游处为名。西征指他 1927 年取道山西赴西安探望父亲和吴芳吉之行。南游是指 1928 年暑假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之行。13 卷共收了从 1908 年至 1933 年间所写的 991 首诗和 25 首词。

诗集后有一个“附录”，篇幅很大，其实是个文集。收纳了他在《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诗论和

文评 27 篇。还有《余生随笔》、《英文诗话》、《空轩诗话》3 个短集。

吴宓写诗特别讲究真诚，他最反对“效报馆之鼓吹，市侩之广告，插标自炫……剽窃时誉”；又把“叠韵斗险，雕字镂句”的“卑靡纤巧”之作视为“诗中之下流”。所以他的诗每一首都有所会心，发自肺腑，无论是自叹、自励、述怀、感时或是吟咏景物、忧国忧民之作都有值得玩味的深意。

忧国忧民是吴宓诗的一个特点。以《清华集》为例，其中的《秋日杂诗》六十首、《感怀八首》、《春日感事》八首都是反对袁世凯的。有时他竟按捺不住，迳自在按语中点明。如在《书王临川诗》中自注：“凡此皆针对袁项城之设施而言”。《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哀青岛》则感叹日人强占青岛的，慷慨抒发了对国家局势的忧愤。《哀青岛》说，“廿载山河易主三，天道茫茫未易参。……圣地渊源称齐鲁，一例蹂躏成赤土……”真有椎心泣血之感。

吴宓诗的另一特点是真：事真、情真。他说，“世中万事皆可作伪，惟诗不能作伪。人生处处须行节制，惟诗中之感情则当令其自然发泄”。如他的《西征杂诗》七律 105 首，形式仿效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主要描写从北平经山西回西安省亲的所见所闻。他自己说这些诗“首尾一贯，为整详之日记”，可见其真。

吴宓写诗真，编诗集也真。他不赞成把写过去的诗进行删汰，更不赞成修改，他说，“盖诗首贵真挚，纵有缺失，亦属当时的心灵写照。时异境迁，决难再寻诗中之真情感也……盖吾之缺失若畏人知，则不当作诗，既作而复删之，是自欺也”。他的《吴宓诗集》就是这样结集的。“所作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留下了真正的吴宓其人其事其志其趣，展示于读者眼中。

为坚持一个真字，他吃了许多苦，声誉也大受伤害，可是他义无反顾。其中最严重的是他为毛彦文写的诗。

吴宓 1921 年回国，随即和浙江杭县的陈心一女士结了婚。婚后生活正常，有了三个女儿。1927 年他却忽然提出要和陈离婚，原来此时他已爱上了毛彦文。那时毛在上海工作，吴跟她恋爱，并且两人有了婚嫁之约。此事颇受誉议，许多至友也颇不以为然，但吴却痴情不改。他和陈终于离异，1935 年毛彦文忽然背约，与曾经作过袁世凯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结了婚。这时熊已 66

岁，而毛只有 33 岁。这事对吴宓打击极大，也远不算光彩。可是他却把为此事写下的诗一一公开发表，后又原样收入《吴宓诗集》。其中有颇堪玩味之作，如“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箫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但也有近似“打油”的白话文，如“绕地一转到欧洲，钓得金鳌又脱钩”，“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他却照样发表，原样入集。吴宓之真确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所以一时有狂生之名。

吴宓之真，还表现在他对另外两个女性的感情纠葛上。一个是他 1930 年至 1931 年在欧洲旅游时结识的格布士(Harriet Gibbs)小姐，吴宓称之为“异国仙姝”。另一个是他 1933 年在杭州旅游时结识的卢葆华。卢是贵州人，善写诗，只身居上海，在杭州偶遇吴宓，两人诗作酬和，互相倾慕。吴宓在赠她的诗中表现了来生婚嫁之愿。有关这两个女性的诗和记述，吴宓也不加删汰，收在集中，公诸与世，并不畏惮人言。

吴宓敢于这样作，固是出于对真的追求，也说明他的自信。他和这些女性的关系固然是浪漫的，却也是柏拉图式的。就是和有婚嫁之约的毛彦文，相恋 6 年仍一直保持了一尘不染的关系，表现了一个新人文主义者恪守伦理原则“以其二克制其一”的态度，也表现了一个孔子信徒“发乎情止于礼”的节制态度。

吴宓素有狂生之名。他之所以狂，是因为他太真，具有诗人的气质而为世俗所不理解。莎士比亚说，“诗人、情人和狂人都是幻想的产物”，可见三者相通。柳诒徵《两吴生集序》说诗人“不盗人，不贼天，掉臂独行，独往独来，一颦一叹一波一磔皆吾肺腑，予人无与。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之，亦可也”，说中了要害。作为学者和教师，吴宓是谨严的，但作为诗人，他却一片纯真，敢于“掉臂独行，独来独往”，不把世人的讥议放在眼里。这是吴宓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人以为狂，不过是皮相之论。

关于吴宓的狂，还流传过一些逸闻。比如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硬叫文林街一个饭馆改掉了“潇湘馆”的名字，说那褻渎了林黛玉；在武汉用手杖赶走了法国领事馆一个狐假虎威的官员；在北平坐人力车遇上剪径的，车夫被击受伤，吴在强盗逃走之后把车夫扶进车里自己拉回家给他包扎。这些传说有的被渲染得很富有戏剧性，却大都有事实根据。吴宓的确有点与众不同：“狂”。

六 西南联大、武汉大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8日日军侵占北平。吴宓于11月到达长沙,次年1月清华师生分两路入滇。一部分300余人经贵州步行到昆明,另一部分800余人经广州、香港,乘船经越南的海防、河内再坐火车到云南,吴宓走海路。1938年4月,文、法、商3个院在蒙自上课,9月,全校迁至昆明,与北大、南开合并,称西南联合大学。

吴宓这时作联大外文系教授兼清华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4年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缺任,由吴宓暂代。以后陈也往往忙于其他工作,系务实际仍由吴宓主持。

吴宓身兼三个实职,工作十分忙碌。除了上本科和研究生课,他还要处理日常事务,历届留美考试试题也还要他负责拟定或审查。1942年他又被聘为部聘教授,也增加了负担。但他仍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研究《红楼梦》,发表了一系列讲演和文章。

他是怀着满腔抗日热情投入工作的。1939年清华评议会决定按例给他一年研究假,他以“抗战期间应加紧工作”为由放弃了。1943年清华评议会再次给他研究假,他也迟疑。这年哈佛大学邀请他赴美讲学,他也同样理由婉拒,后来是金岳霖先生去了。

1944年吴宓终于决定休假,拟定了研究计划和外出讲学办法。9月,他应在成都的燕京大学之聘去成都,途中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停留了半个多月,作学术访问,和老友梅光迪、郭斌和及缪钺等人见了面。吴宓在浙江大学作了“红楼梦人物分析”的报告,然后到了成都的



1944年,西南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燕京大学。吴宓选择燕大,是为了陈寅恪。那时陈在成都燕大。

原来陈寅恪1940年从昆明联大取道香港,赴英国讲学,到港后却被通知暂缓一年赴英,遂留在香港大学任教。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1942年陈才辗转脱险,因到后方,在燕京任教。陈陷香港后,吴自然是着急的,听见他回来的消息,当然迫不及待想去看他。吴宓到了燕大,两人劫后重逢,都极高兴。不久陈左目不明,在医院动了手术,吴几乎一有空就到医院探视陪护,同时诗作酬唱,写了好些诗,也交换了许多学术心得。

在燕大期间,吴宓曾赴在乐山的武汉大学作过有关《红楼梦》的学术讲演,会晤了老友刘永济、姚文青。又在乐山乌尤寺的复性书院与院长马一浮见了面,和他切磋诗艺。

远在20年代吴芳吉就曾多次在信中夸耀蜀中山水,要他来看看,这次他是如愿以偿了。这一次的四川之行播下了他1949年西上四川的种子,影响他一生很大。

1945年8月9日吴宓不慎在成都跌倒重伤,接着胸部又患痲疽,医生说他“数月内断不能以任何方式旅行”。正好不久抗战胜利,各校开始考虑复员,吴宓遂去函清华请求续假一年留燕大上课,然后去武大任教,随武大复员,再图北上返清华,得到同意。1946年吴宓去了武昌,在武大外文系作教授。

1947年武大发生了“六一”血案。6月1日晨三个学生被军警枪杀,许多师生被捕,其中有外文系教授缪朗山。缪被营救出狱后决定去香港。吴宓冒着白色恐怖亲自送他到了机场,缪登机之后吴仍不离开,一直守候到缪来了电话,说他已经安全抵广州才走。他说:“缪先生是外文系教授,我是系主任,我要对他的安全负责。”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奋不顾身的巨大勇气。

这一年吴宓见朱君允教授跟三个成年的子女住在狭小的屋里,很不方便,便把领导上新分给他的环境优美的宽大住房让给了她们,自己仍住偏仄的旧屋。

七 《红楼梦》研究

吴宓早在留美期间就已开始了《红楼梦》研究,已如前述。抗战期间他更作了大量《红楼梦》研究。他作了多次演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对全书作总评的,如《〈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等;有对人物作研究的,如《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论紫鹃》等。主要刊载于成都的《流星》和《成都周刊》上。

吴宓的《红楼梦》研究思路近似美国的新批评派,又往往从比较文学角度分析,独树一帜,与此前的蔡元培和胡适两个体系都不相同。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对《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作了大量考证,从中分析出许多政治含义。如红楼梦、怡红院、悼红轩、贾宝玉爱吃胭脂等看出了红即是朱,朱即是明,因而《红楼梦》乃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书,是排满的书。又进一步推求《红楼梦》人物与清初人物的关系,作了许多考证。胡适不赞成他的作法,称之为“猜笨谜”。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判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頔”、“宝玉即是曹雪芹”,强调了从作者的生平家世来研究《红楼梦》,也因此而重视版本的辨伪和研究,但有注意原型忽视典型的倾向。用吴宓的理论讲便是混淆了文艺创作中现实(Actuality)和幻境(Illusion)、真境(Reality)之间的界限。蔡和胡都有一个倾向:功夫在书外。一个侧重历史,一个侧重作者。而吴宓研究《红楼梦》,则着重研究作品本身,即“文本研究”。这是美国新批评派的特色。

就国内渊源而论,吴宓的《红楼梦》研究与王国维的思路一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大量采用了西方理论,主要是叔本华的思想,对《红楼梦》本身作出评价。吴宓也采用这一方法,但不囿于一家,而是博取西

方众家理论进行研究。由于他通晓世界文学,更用外国文学作品跟《红楼梦》作比较,因而更能揭示出该书的特色和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吴宓对《红楼梦》的总评价是以哈佛教师G·H·玛格纳地埃(Magnadier)的理论为根据的。玛格纳地埃在

分析H·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时指出,好的小说必须具备六个条件:(一)宗旨正大;(二)范围宽广;(三)结构谨严;(四)事实繁多;(五)情景逼真;(六)人物生动。吴宓用此标准分析了《红楼梦》之后说“《红楼梦》不仅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又说它“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诸西方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方小说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这个结论是广泛研究了西方小说,又深入研究了《红楼梦》之后得出的,并非夜郎自大;比起当时鄙薄《红楼梦》以为不能入世界文学之林的说法,表现

了清醒的头脑和真知灼见,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较早的一枝奇葩。

杨周翰曾为文强调吴宓的文学批评有情有理,说:“有理不稀奇,有情却是可贵的。”说得极好。吴宓评“红”往往带有自己深沉的好恶。他批评紫鹃,最后的话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他把自己当成了紫鹃。他分析宝玉差不多像在分析自己:“宝玉乃一诗人也,凡诗人皆(一)富于想象力;(二)感情真挚;(三)而其察人阅世以美术上之道理为准则。”而“美术(艺术)家惟事审美,求其心之所适,世俗中事,不喜过问,而又任自然,重天真,身心不受拘束”。这个断语抓住了宝玉的根本特点,也差不多是吴宓的夫子自道,好恶是非自在其中。他分析林黛玉“本有其完美之资格”,但因“直道而行,不屈不枉,终归失败”,也有吴宓自己的面影。



吴宓是诗人,有一种近似于痴的特别感受力。他在昆明见到一匹马累死在路旁,竟泫然地说:“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匹马。”对马如此,对宝玉、黛玉、紫鹃这些他所爱的人物岂能不更加如此!他看《红楼梦》世界里的人的眼光和感情,也就是宝、黛、紫鹃的眼光和感情。在我们读到他以学者的头脑分析《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伦理观和哲学观时,须记住那些都

是吴宓出自深情的肺腑之言。

吴宓又拿《红楼梦》的写作手法对比西方小说,说西方小说往往有作者插入的长篇议论、烦琐的心理刻划和与情节关系不大的背景描绘;而《红楼梦》则在“芜词空论删除净尽,描绘人物均于言谈举止喜怒哀乐形于外者见之”。因此读者总神游在人物之间,故事之中而不觉沉闷。这种说法也许失之偏颇,但《红楼梦》的写作特色却因这一对比而跃然纸上。

八 重庆二十八年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溃退,有人曾邀吴宓到美国讲学,也有人邀他到香港大学任教,他都婉辞了。在那时的形式面前吴宓很感彷徨,对磅礴于中国大地的新力量他不理解,去国出走他又不愿意,1949年4月底他离开武汉西走重庆。

吴宓曾拿自己的名字作过一副带点谐谑的嵌字对联,“一生长畏风雷雨;三宝终归佛法僧”。此时他面对着卷地而来的滚滚风雷感到畏惧,所以确曾有过皈依三宝削发为僧的打算。他西走重庆就是准备去峨眉山剃度的。但他终于眷恋他的教育岗位,并没有遁入空门。从那以后在他海外的旧友和学生之间就有关于他出家的传说,那并非是空穴来风。

吴宓到重庆后在沙坪坝重庆大学任教,跟清华学堂的老同学刘璞(柏荣)在一起。

1949年秋冬吴宓在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两处任教,同时在江津白沙的“白屋文学院”义务兼课。一身三任,很是辛苦。

在此之前梁漱溟1948年息影政坛,在重庆北碚创办了勉仁文学院,吴芳吉的次子吴汉骥在那里教书。1949年梁漱溟委托吴汉骥在江津白沙留马岗的邓家祠堂创办勉仁文学院分院,后因故停办。吴汉骥即在当地名流夏仲实等人支持下利用已有条件创办了“白屋文学院”,用以纪念“白屋吴生”吴芳吉。

1949年秋冬吴宓约了刘璞一起到白屋文学院义务

轮流兼课。重庆距白沙很远,上课很辛苦,必须在前一天到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住宿一夜,次日晨5时许去挤轮船。因是上水,船行缓慢,到白沙已是下午颇晚。次日开始上课,一月后再回重庆,由另一人去接替。他们不但义务上课,还要自己出旅馆费船费,还要坐在硬板凳上饱受长江风雪之苦。他们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学期,直到1950年“白屋文学院”停办。

1950年吴宓到了风光绮丽的北碚,在勉仁文学院中文系作教授,同时在嘉陵江对岸的相辉学院兼课。吴宓此时住在北温泉的松林坡半坡上,住房虽然简陋,环境却极清幽,江水云影,四面松涛,他很觉怡然自得。

1950年秋成立了西南师范学院,地点在磁器口,吴宓到此任教。1952年该校迁北碚缙云山麓。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1950年在全国展开。吴宓一生虽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但出身“大官僚”家庭,留学美国,又是受过鲁迅批判的《学衡》总编辑,处境本已不利,偏偏又在土改运动期间写了几首诗,表现了对土改某些作法的理解,所以曾被点名作检讨。1952年吴宓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作人民教师》的文章,算是对两年多的思想改造的总结,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这篇文章还曾被《光明日报》转载。

这时外语教学出现了一个大变化,在学校里取消了英语,改设俄语。吴宓懂得英语、法语、德语、拉丁文,

偏偏不懂俄语,便跟外语系的教师们一起听俄语课。他学得很快,不久便可以用俄语阅读了。与此同时苏联文学又取代了英美文学在大学外文系的地位。吴宓深通世界文学,对苏联文学作品却接触得不多,对斯大林体系的文学理论更是陌生。他被调到了历史系,以后又调到了中文系。

1953年吴宓和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邹兰芳结婚。邹一向体弱,高瘦而苍白,1956年因肺结核病逝。吴宓悲恸至极,从此每年节日加餐总要多摆两副筷子,算是悼念亡妻和亡友吴芳吉。这种发自至情的行动,在“文革”中竟被说是“搞封建迷信”。

1955年吴宓被安排做了四川省政协委员、西南师范学院院务委员。次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调整和教师定级,他被评定为二级教授。

吴宓生活极节俭,工资很高而自奉极薄,一张纸一截绳都不浪费,节约下的钱除了买书全部给了别人,亲戚朋友甚至毫不相干者,但凡开口他都给。工资一到手就30、20往外寄,有时到了月底还得到互助储金会借钱度日。他的这种急人之急、助人为乐的作风,“文化大革命”中也遭批判,说是接济坏人,被他接济者跟他是“一丘之貉”。

就在这一年,吴宓把自己多年来在国内外选购的图书1000余册(其中不少是绝版的珍本)从北京运来,捐献给了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他把这事看作大事,在每一本(套)书前都墨笔正楷书写了作者简介、内容提要等注意事项,方便读者参考。这表现了他对育人的热情,对自己的书籍的珍惜和熟悉。

1956年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恢复了英语专业,但因英语课在中学已停开五六年,新生入学只有从字母开始。同一年国内有些大学招收了副博士研究生。

1957年印度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来重庆访问,重庆市川剧团为客人演出了川剧《秋江》。西南师院外语系几个教师参加了接待工作,把《秋江》译成了英文,请吴宓润色修饰后使用。这大约是吴宓所参与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了。

1957年吴宓在全国范围内招收进修生(即上一年的副博士研究生,只是无学位)。但因“反右”运动,录取通知书压下未发,到运动结束考虑了师生双方情况才发出的。9月,签名招的3个进修生来校,教学计划由吴

宓拟定,第一学期主课为《世界文学史》,由吴宓讲授。指定作品和参考书由学生阅读,同时听课、讨论。

笔者是吴宓的3个进修生之一。因是第二次作他的学生少了些拘束,常去看他和求教。有一次我曾建议他再写文章,特别是有关“红学”的。他的回答是,“我现在要‘持盈保泰’,以不写为宜”。他用的“持盈保泰”四个字至今记忆犹新,可见他对自己当时的地位感到难得,也很珍惜,不愿写文章冒风险。

可惜吴宓“持盈保泰”的打算落了空。1957年冬展开了上山下乡运动、反五气运动、拔白旗运动。吴宓被看作“白旗”,被“拔”了,受到了大字报的围攻。进修生的课只好不了了之。这时笔者已调外语系任教,另两位进修生只好随系上活动,参加了各种运动之后于1959年夏毕业。

1958年西南师院一个院办刊物发表了中文系一个学生批判吴宓的文章,说他反对文字改革,反对简化汉字。据笔者所知,吴宓曾在汉字简化方案未正式公布前的征求意见会上对于方案提过意见,这是正常程序。笔者自己也参加过这样的会,也提过意见。全国搞中文的教师参加过征求意见会的怕有几十万人。但在文字简化方案公布之后吴宓不但不曾反对过,反而叮嘱笔者既是征求意见而后公布的方案我们就应当拥护,不能反对。可是那篇文章却说他反对了,而且加以批判。

从1959年冬起,粮食定量因自然灾害而降低。有一次吴宓在中文系讲《文言文导读》课,为并列联接词“尚……何况”举例,诙谐地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被看作是攻击粮食政策,被停止了上课。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吴宓的处境也好转了。1961年西南师院党委对吴宓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对过去对他的粗暴态度表示了歉意,算是对“拔白旗”、不准上课、发表论文批评的作法作了否定,还了吴宓一身清白。

1961年暑假,形势宽松了些。吴宓作了一次旅行,南下广州,中经武汉,北上北京,西去西安等地转了一圈。在广州他访晤了陈寅恪,相谈甚欢,说他见到了“陈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又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他这里的体、用之说不过使用了一个老口号,其实就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吸取外国文化精华,推陈出新,发展中国新文化。在武汉他访晤了刘永济,刘赠他的《减字木兰花》说:“庞眉书客,自以文章为润泽。执手言欢,狂态依稀十年前……”十年阔别,刘还能在吴宓身上依稀看出当年的狂态,可见他虽然历经风雨,天真依旧,仍然是那个诗人、“狂生”。

在西安省亲后他回到重庆,参加了重庆市政协的活动,并应邀作了有关《红楼梦》的演讲,讲的是《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一次还专门和L·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了比较,这是他最后一次讲《红楼梦》。

1962年学校实行了配备助手继承老专家知识的措施,西南师院为吴宓配备了一个外语系教师作助手。

那时西南师院开展的“四清运动”开始于1964年冬天。在此之前对吴宓的一切无理指责之中,他的“问题”不过是“老顽固”而已,他的品德还一向是受到尊重的。经过这次打击,吴宓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尤其是在对吴宓的为人一无所知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吴宓竟是满身脏污。谣言诽谤不断落到他身上,其流毒之深,到笔者写此文时仍然没有肃清。

笔者想到吴宓对他一个学生说的话:“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为他们好,好就软弱,就不会权变狡诈,就不会应付,就成为牺牲品。”吴宓就是这样,因为是好人,不会权变狡诈,不会应付,成了牺牲者。

1965年“四清”结束,吴宓第二次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在西南师院开始,吴宓被揪斗,成为“牛鬼蛇神”。8月某日开全院批判大会,“牛鬼蛇神”站了满台,73岁的吴宓躬腰站在台前,终于不支,晕倒在地。西南师院的两派分裂也正好从这一天开始,并从此逐步升级,西南师院成为武斗中心和武斗策源地之一。吴宓在这个期间备受欺凌折磨。

1969年春吴宓被游斗,这时他已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原来吴宓一向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坚持不懈。他的日记被抄,在其中被发现了的对江青、姚文元等人不满的话,如“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下”,“(江青)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刀子给孩子玩,没有

不伤手的”。在和红卫兵谈到刘少奇时,吴宓竟说他并没有受到刘少奇宣扬的孔孟之道的的影响,对于孔孟之道他比刘少奇更了解。吴宓永远是个不设防的城市,尽管四面充满杀机,他说出嘴的写在纸上的仍然是肺腑之言,竟因此遭祸。

这一年远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按林彪1966年的战备令合并南迁,看中了缙云山麓西南师院风景如画的校园。西南师院被迫迁往梁平、忠县两地暂住。那时还有一部分系科留在北碚未走,吴宓以年老体弱为由请求暂留北碚未得批准,随大队被带到了梁平一个过去的劳改农场。

1969年3月9日吴宓在被批斗时摔断了左腿。3年后吴宓给老友姚文青的信中叙述了这场不幸:“在‘斗争宓之大会’上派两名学生拉宓(罪犯)入场(跑极快),中途在平铺砖地之‘食堂’中猛被向前推到(宓向前方跪倒地上),结果左腿扭断……现今必须左手拄杖,否则不能站立,更不能走步。”信中又说他的左眼在1971年6月忽然全盲。

那信还谈到他的生活情况。从1970年9月起每月只发给工资37元(他的工资是272.50元)。他只能每天早上买两个馒头,早晚餐各一,没有菜,冲着水吃。中午买5分钱菜,吃3两饭,菜不能选择。独住一室,“似是工棚(无顶、席编),大雨则上漏,平日地面是黑泥土”。这时吴宓已是78岁高龄。

1974年“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吴宓的倔强劲又来了。他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竟然明确表示不赞成批孔。他说:“宓不像XXX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批周恩来宓不赞成。”据说那一年在全国知名知识分子明确表示不赞成批孔的有三个:吴宓、梁漱溟、容庚。

吴宓1972年被放回北碚,因腿断、日半盲、年迈,生活无法自理,请个婆婆照顾,每月工资10元。仅凭生活费37元无法维持,只好四处向亲友告贷。这时给他支持最多的则是他已离异的夫人陈心一和他的三个女儿。他也曾向老友姚文青借贷,而姚当时处境比吴更糟,只好向亲友处借了10元寄给他。吴知道后不但寄还了那10元,又从借来的钱中抽出一点给姚寄去,并向他道了歉。涸辄之鲋,相濡以沫,吴宓永远为别人着想。

1975年吴宓的所谓罪行不了了之，工资恢复，积欠的工资也补发下来。吴宓拿到了钱急忙还债，剩下的一大笔钱又都帮助别人去了。他的妹妹两年后来接他时，他仍家无长物，连衣服也全是旧的、破的。借用一句当时曾流行的话，“他心中充满了别人，唯独没有自己”。可是，这样的人却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1977年1月吴宓的妹妹吴须曼从西安来重庆，把他接回了老家涪阳，这时吴宓已差不多两眼全盲，左腿也已残疾。1978年1月14日吴宓病危，送医院抢救，17日凌晨3时在涪阳辞世，终年84岁，死后葬在嵯峨山下。嵯峨山有极其悠久的历史，相传是四千多年前黄帝铸九鼎之处，吴宓生在嵯峨山下，也长眠在这片文化的沃壤里。

吴宓的学生钱钟书曾说吴宓是亚里士多德定义下的悲剧人物，这大约是指他的理想与时代脱节，那是早期的吴宓。晚期吴宓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但他那顽强的、孤独的执着却给悲剧增添了悲壮。吴宓总生活在他所说的“真的世界”(The world of truth)里，而他周围的人却有些是他所说的“浮华市场”(Vanity Fair)中的弄潮儿。这一事实也给吴宓悲剧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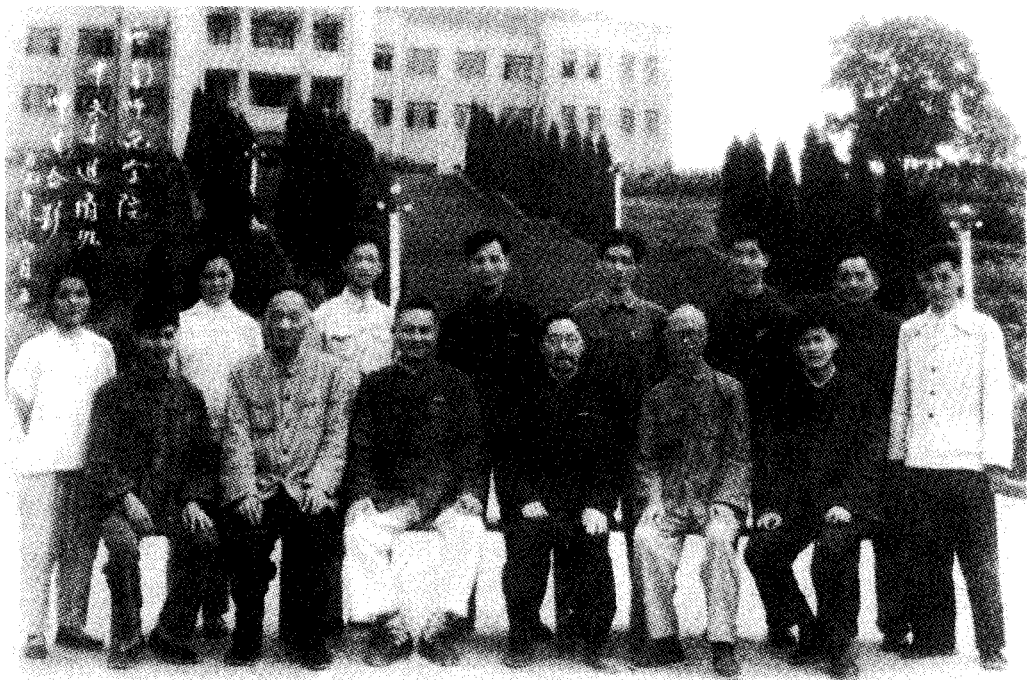
用。

1978年12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冯至、朱光潜、李赋宁等30多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要求为吴宓平反昭雪。

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全校教职员大会，为吴宓平反，恢复名誉。

1988年李赋宁在陕西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上作了《怀念恩师吴宓教授》的报告。1990年、1992年、1994年由陕西省政协和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陕西师大、西安外语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召开(按：2004年冬又召开了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吴宓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思想受到高度肯定和发扬。这位终生真诚耿直、热爱祖国、勤勤恳恳献身于教育与文化事业，并作出过巨大贡献却于老年备受摧残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先驱可以含笑九泉了!

(选自《第四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王文、蔡恒、刘家全主编，2005年西安地图出版社，本文略有删减。)



1956年6月5日西南师范院中文系进修班师生合影(前排右二为吴宓)

(责任编辑：郝龙)



忆吴宓先生晚年在西南师范大学*

□文/胡国强



1954年与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合影(右三为吴宓)

在纪念尊敬的吴宓先生诞辰 96 周年前夕,我们不禁心潮起伏,思绪难平。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教育事业的品节;治学严谨、识见深广,积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志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宏愿;爱护学生,诲人不倦的风范……一起涌上了我们的心头,不仅激起我们对他的无比怀念和崇敬,更激励着我们学习他的高风亮节;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吴宓先生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1949年4月,人民

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先生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毅然谢绝了友人之劝,决定不去美国讲学,不到香港大学任教,更不去台湾大学执教,继续留在大陆工作。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此后,又多次对劝他出国或去台湾的学生、友人说过“宓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先生对祖国的一腔热忱,溢于言表。1949年5月,先生从武汉来到四川重庆,执教于重庆大学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院校,在这里他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四川的山川风

* 原文如此,时应为西南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

土人情使先生产生了极深的感受。他在这里迎来了巴山蜀水的新生,表示要在这里为新中国、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终老一生。1950年7月,他给邀请他回北京任教的友人的回信中写道:“重庆之学校为理想事业,又夙爱四川之风土人情,早决定以终生老于蜀,不复再出。去春亦有‘余生愿作剑南人’之诗,故来时尽携书籍衣服等物。”他又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川重庆,岂非中国人民政府之辖境乎?宓极喜四川,在此一切甚皆满意,故不愿往他地。”

先生热爱祖国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是密不可分的。解放前,先生虽然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但他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黑暗及其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残暴行为是不满的。1946年,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当“一二·一”国民党政府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时,他曾资助被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学生以路费,让他们离开昆明。1947年先生在武汉大学任系主任时,当“六·一”惨案发生后,又尽力保护当时被国民党特务指为共产党之外文系教授缪朗山(号灵珠)先生,并亲自护送缪先生到机场坐飞机赴香港,使缪先生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先生是高兴的,他曾在给北京友人的信中写道:“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之一年为新中国解放年,为解放军胜利年,为中国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之年,为和平、自由、光明及一切进步降临中国之年。吾辈生当此际,躬逢其盛,自与全中国人民一同欣喜,兄等欣喜,宓亦欣喜。”面对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先生努力学习,重视思想上的革故鼎新,紧跟社会前进。他曾在日记中写道:“1949年11月重庆解放时,甚为安适。1950年2月至3月,改住相辉(学院),每随教职员学习,研读新书,自求进步。为中国人民政府及为人民服务尽职,即是作一个真正忠实勤苦之教授。”

先生在党的教育、关怀下,思想感情不断变化进步。他对党的领导是拥护的,对党的各项政策是赞成的。远在1950年初,他就在给友人的信中满怀真情地说:“重庆之军政最高当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公正贤明,为众所称颂。尤以处事行政明达审慎,不为操切激烈之改革,诸多政令逐步稳健推行,于是,民受其福,国收其利,

而宓诚愿乐居此方,隶属编氓矣!”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示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师范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先生即到该院任教,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楚图南和院的党政领导的尊重。党对吴先生的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使先生高兴佩服。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先生自觉地批判了自己的封建复古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表示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的文章,对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当年《学衡》派与鲁迅先生的那场争论,先生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曾对学生说:“有一件事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有人说我反对鲁迅,没有那回事。三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是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很正常的。对鲁迅先生,个人是非常敬佩的。”他又曾对友人说:“那时我们有些观点绝对了,鲁迅是对的。”先生有这么一个特点,对于以往自己的认识和观点不易改变,所以有人说他是“老顽固”,其实一旦他认识了真理,改变了过去的观点,他是无比欣喜的,对鲁迅先生的看法的转变就是一个例子。又比如他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党的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方针,都是极为赞成的。他曾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灭绝中国文化,那是受了反动宣传所致。宓观毛主席博古通今,中国文化底子很厚,他的那些诗词,精美绝伦,宓很佩服。”1956年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先生的心情极为兴奋,他认为党对他的关怀太多了,表示“愿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愿老死于西师”。先生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但他不善词令,如有次在会上,他非常高兴地说:“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且不说他,但先生对共产党童稚一般的真实感情,却实在是溢于言表。1953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党和政府提出了根治黄河的计划。先生很高兴地表示拥护说:“这是我亡友李仪祉生前一直所向往而未达到之事,今天达到了,了结平生心事一件。”1961年暑假,先生在组织安排下游访了广州、武汉、北京、西安等地,亲眼看见在党的

领导下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认为祖国的建设成就的确伟大,他把这次旅行说成是“一次大的思想改造”。回校后,先生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院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了青年助教进修班的课程,组织又给他配备了青年助手,先生心情极为舒畅,工作更加积极。不久,先生患了背痛,养病期间受到院党委亲切照顾和关怀,他很感动。当在医院动手术要病人家属签字时,先生满怀深情地说:“西师党委就是我的亲人,请党委书记给我签字。”

1961年西师党委对吴宓先生进行了甄别,对过去运动中粗暴批判先生的作法进行了道歉。先生心情更加舒畅,他对党委和系总支领导说:“政治运动对我教育很大,我在学术上比政治上错误还严重,对我学术上的批判是应该的,只是有时没抓住我的问题,乱上政治纲。”1962年春节座谈会上,先生又激动地讲,“党对知识分子的照顾无微不至,现在是如何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1963年元旦,先生又向党党委表示说:“党安排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正当先生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胸怀,决心在晚年为祖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自己贡献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他被打成牛鬼蛇神,被作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血儿”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受到折磨、摧残。先生对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没有屈服,对他们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进行了抵制,他在日记中写道:“刘少奇、彭德怀是忠,林彪、江青是奸”,还写了许多对“文革”的意见,因此被打成“死硬反革命分子”,遭到了更残酷的批斗,身体致残,但先生仍然没有低头。他始终认为:“共产党是好的,但出了奸佞小人,下情蔽上,毛主席知晓否?”先生虽处恶境,却毫不为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刘少奇等功在国家,尚且被辱,必何足道。”对于当时“造反派”的野蛮行径,先生也是非常愤慨的,他写道,“顽童欺我、辱我,令人愤极!然念及国家主席尚遭‘造反派’厄运,人权安在!法律安在?”对于古稀之年的先生遭到的迫害,许多院系领导和先生的学生、后辈是同情的,尽管他们也被打成“走资派”、“黑苗子”,无法照顾先生。但先生仍不以自己的不平遭遇为意,常怀报国之心,当1973年学

校招收了工农兵学员后,他要求当时的革命委员会给他安排工作,他说:“宓懂英、法等国外语,可以作文字翻译,也可教授口语”。当然先生的这一良好愿望,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但先生这种精神,却是令我们永远难忘的。

先生作为一个忠诚的教育家,他热爱祖国的教育事业,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建国后他来到了新建的西南师范学院,执教于外语、历史、中文三系20余年,为祖国培养了成百上千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当时刚解放,办学条件较差,各方面都不如北京,但他谢绝了友人请他回京任教的邀请。先生认为:“四川(西南)学生一样聪敏好学,而需要一位西洋文学通博详实而又授课讲解认真且得法之好教授乎?目前具此资格者在重庆(在西南全区)实只有宓一人,是故为国家计,直应遣派宓驻此地区。”先生之不上北京而留在重庆任教,完全是为了发展当时偏僻、落后之西南地区的教育,是为了支援新办学校。为了西师的发展,1956年春,先生无私主动地将他多年珍藏的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文的图书(其中不少是早已绝版,在国外亦属珍本)共约1000册,特地从北京运来并亲自逐册用汉语译出书名,撰写该书内容提要以及作者简历,然后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此前后加上国内出版图书,先生共捐赠了三千册图书给西师图书馆,丰富了西师图书馆的藏书,促进了西师教学和科研的发展。

先生在教學上坚持“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精神。先生的中外古今知识皆博大精深,可是治学仍是十分谨严,工作一丝不苟。他在西师讲授过“世界史”、“西洋文学史”、“外国文学”、“英国文学”、“古代文学作品选”、“英语”等课程,除在本科上课外,还上过进修班的课,带过研究生。先生无论讲什么课,教学计划均科学周密,指导学生细致详尽,有问必答。计划安排做到课堂讲授与课外辅导结合,并拟使校内教学与校外参观访问结合。每上课前15分钟到教室,第一次上课前首先带领学生到图书馆介绍中外各种工具书的特点及其使用方法。讲课中旁征博引,板书工整,生动有趣。课外认真指导学生阅读教科书和必读作品,对教科书的不

当之处,作品的误译处或难于理解处均一一订正,亲笔眉批、旁批在学生的书上。为了提高学生的水平,他自编英语语法教材,代替规定的繁琐的语法教材。他还用英语原版的《英国文学史》作英语教材与自编英语语法相配合来培养、提高学生阅读原文的能力。谈到先生对学生的教育,真可谓呕心沥血,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向他请教,也无论是他认识的与不认识的学生,都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循循善诱。1963年暑假前,先生给中文系青年教师作“如何治学和学外语”的报告,结合自己的经历说:“治学和学外语都要专心致志,锲而不舍。要像对待自己的情人一样,天天接触。学习时,大脑要像抽屉一样,驱除邪念,把知识系统地储存在抽屉里。休息时把抽屉全部关上,充分休息。”生动的比喻,语重心长的教诲,使大家永远难忘,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先生考试的试题活而难,要求严格。如有次给进修班考英语时,试题是先生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学生当堂翻译,如果平时没有掌握好基础语法和大量词汇就考不及格,这就避免了学生考前临时抱佛脚、临阵磨枪和猜题的侥幸心理。而且考试时间也不作限制,从上午八点半可以考到下午二点,其间,先生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食用,中午先生也不用餐,陪着大家,然后根据交卷时间先后和卷面情况综合考查学生,最后评定成绩。先生关心学生的学习,如果有些书籍图书馆没有,书店也无卖的,而先生有,无论是珍藏的孤本、珍本或借或送学生,得过先生赠书的学生不少。平时,先生只要看到学生站在书店想买书而无钱购书时,无论这些学生认识与否,先生必当场掏钱买下,送给买书学生。

最令人难忘的是“文革”十年,先生身处逆境,却还不忘教育学生、后辈。中文系青年教师王锦厚查《红楼梦》的资料请教先生,先生不顾自己的处境困难把资料详尽地写在纸片上,告诉了王锦厚。现巴蜀书社编辑周锡光在七十年代初期的寒、暑假,多次来向先生请教,朝夕相处,如坐春风,聆受教诲,先生给他讲授了许多知识。当时凡有学生和晚辈向先生请教,先生都是谆谆教诲,丝毫不怕对他加重批判。

吴宓先生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通晓世界多种语言,博览群书,知识丰富,治学精审。先生一

生写了大量宝贵的日记和诗作,日记中保存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史料。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用阶级观点来指导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他认真学习了苏联编写出版的《社会发展史》,学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论文艺》等著作。由于年事已高,先生对阶级斗争的学说,一时还掌握不了,但他总是力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观点去指导、教育学生。学生如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写出的论文,先生在评语中都是高度肯定的。如先生在1964年7月17日对江家骏进修毕业论文《亨利·菲尔丁和他的〈汤姆·琼斯传〉》的评语中写道:“本论文之作者,阅读广博,用力精勤。论文之规模、结构及英文文笔,已达到进修论文及一般著作之标准。至其内容……完全遵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用阶级分析批判一切;指出菲尔丁之优点及缺点同在,菲尔丁之观察与愿望不符,而归本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世界观与道德、文艺标准之根本差别,可谓站稳立场,读书得间矣(如此研究英国文学,教者与学者可均无憾)……所选书中二例,亦能表现本论文之作者对剥削者之愤恨与对劳苦人民之敬爱,随在不失其阶级立场与阶级观点。总之,此论文可谓能具有批判地研究接受中西古典文学之正当态度与方法。此评。成绩优。”此外如曾婉凤的毕业论文《论〈约翰·克里斯朵夫〉》,先生肯定了该论文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分析,成绩为优。

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比热爱,他虽然留学美国,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但他并不崇洋媚外,而是主张中西文化交流,并且贯彻在他的教学和科研中,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传授民族文化。解放前,先生在梁漱溟先生举办的勉仁文学院多次讲要弘扬中国文化。在江津又参与举办白屋文学院,也是为了弘扬中国文化。解放后,先生仍不遗余力坚持弘扬中国文化,主张中西文化交流,不为“左”的思潮所动。“文革”中“四人帮”一伙搞“批林、批孔运动”,先生坚决反对,他说:“宓不像xxx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批周恩来,宓极不赞成。”又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化,对《红楼梦》等名著,都深有研究。

吴宓先生又是一位襟怀坦荡、表里如一、对己严、

待人宽、具有高尚品质的长者。先生生前对自己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宓解放后的生活、工作态度,一贯是真诚坦白,热心积极,生活仍旧勤俭,努力工作。对工作及一切事物均负责;劳动积极参加;游行等事,自动参加;政治学习,一贯早到,不缺席,必定先读指定的文件,且勇于作出宓明知不免错误之发言。(凡此皆由宓一贯之性格及习惯,从前如此,今仍如此,不敢说是‘进步’,但绝不是‘伪装进步’,因宓少年、壮年亦从无虚伪做作、钩心斗角、设计图谋、以及计较名利、忌嫉又贪欲之习惯也。)”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如先生的友人评价先生那样,他是“独行君子”,不管时风如何变化,他都坚持自己的操守;先生又是“真人”、“真正的人”,对人、对己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先生更是“共产党的诤友”,他对党和毛主席是热爱的,拥护的,但有什么意见也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从未考虑什么利害得失。即使“文革”中受到那么残酷的迫害,他对党和祖国也从无怨言,表现了一个爱国的老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先生是国内外知名学者,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均出自门下,但他从未有矜持之色,总是一贯谦虚、谨慎待人。先生要求自己严格,这一点是大家都熟知的。1956年评定工资,西师党委根据先生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和解放前部聘一级教授,评定先生为一级教授,先生写信给党委,坚辞不受。领导叫曹慕凡先生去做工作,他对曹先生说:“彼余冠英等(这些人都是先生的学生或后辈)都是二级、三级,我吴宓何能一级呢?”又说:“共产党待宓太好了,宓怎能提过高的要求呢!”硬是不同意评一级教授,最后只评了二级教授。当时使曹先生感动不已,在全院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先生在衣、食、住、行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贯俭朴,粗食布衣,自奉甚薄,但却十分乐于助人。先生平时皆布衣(布衬衣、布中山装)、布鞋,吃的是馒头、面条、米饭,菜是素菜,只不过每天煮有一至两枚鸡蛋,或一份红烧肉,先生不抽烟,酒也喝得很少。一床蚊帐,从1938年用到“文革”后退休,用了近40年。住的是两间很小的屋子,却怡然自乐。平时,都是安步当车。去市内讲学,也是坐公共汽车,从不要专车接送。先

生对于废物尽力利用,他写日记的纸,都是用过的信封翻过来使用的,而且连一块小纸片也舍不得丢掉,要拿来作备课用纸。可是他对亲友、学生、乃至有困难向他求援的陌生人,却总是解囊相助,从不吝惜。如友人吴芳吉(白屋诗人)去世后,先生对其夫人、子女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令人感佩。先生每月290余元的工资,领到后,除留下70元作生活和护理费外,其余的工资都按名单寄出,资助师友和学生。有时有人求援,先生手边无钱时,还去向老朋友处借钱来帮助别人。先生认为:“助人为乐”的道德,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极平常的事。“宓就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今天想起先生的这些高尚行为,怎不令人肃然起敬,无限感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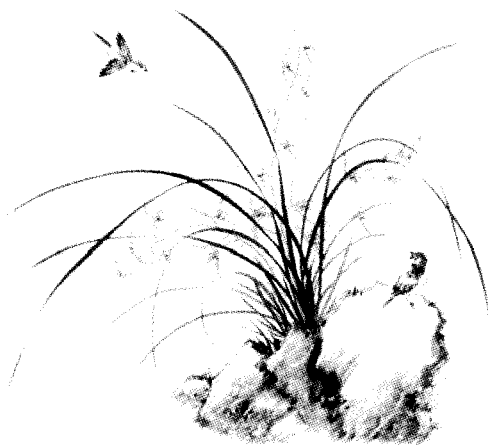
吴宓先生一生值得怀念、学习的品德,真是指不胜数。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生的遗志,弘扬中国文化,办好教育事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材。

1990年6月于西南师范大学

(杨光彦、曹廷华、江家骏、曾婉凤等同志参加了此文的讨论和修改)

(选自《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李赋宁、孙天义、蔡恒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责任编辑:郝龙)



恩师吴宓先生在重庆

□文/江家骏

恩师吴宓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恩师的音容笑貌，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他在我心中的光辉，以往的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记得四十八年前的秋天，我考入了重庆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在外文系举办的入学迎新晚会上，我被恩

师叫到他身边。因为我是江津人，与恩师的挚友知己吴芳吉先生是同乡，又听我能背出他问及的吴芳吉先生的《婉容词》，恩师感到格外高兴，似乎对我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当时他就教给我一些学习外语的方法和要领。当恩师知道我还是一年级新生又特别喜爱英美文学时，他立刻就面露喜悦，热情地告诉我，只要与我的正课不

冲突，从下周起就去旁听他为二年级讲的英国小说和为四年级讲的欧洲文学史。我当时说课并不冲突，只怕自己听不懂。恩师说：“能听懂多少算多少。听一下总比不听好。”从此我就每周按时去听恩师教的英国小说和欧洲文学史。这样，我就在恩师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下，开始了我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英美文学的学习和研究。最终我成为了一名高校英语系英美文学研究方向的教师。我能成为一名英美文学研究方向的教师，最初的带路人就是我最敬重、最不能忘记的我的恩师吴宓先生。恩师对我的关爱和培养，我永生难忘。

我在重大外文系读书时，恩师当时是西南师范学院英语系的专职教授，住在重庆磁器口西南师范学院内，而恩师又被重庆大学聘为外文系的兼职教授。由磁

器口的西师到沙坪坝的重大，其间还是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恩师经常都是独自一人步行来去。当恩师在重大讲完上午的第四节课后，已无法赶回西师去吃午饭，因此他就到沙坪坝街上一家很小的饭馆去吃便餐。这时，恩师几乎每次上完课后都叫我陪他一道就餐。就餐时，

恩师一面了解我听他讲课的情况，有无疑难问题。若我提出自己听课中某些不够明白或不懂的地方，恩师立刻就给我解释，同时又专门给我指定下一次的功课，恩师对我的要求既认真负责，又亲切严格，而且他还身体力行。记得当时他要我读纳尔逊和桑



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暨教师于1951年5月15日合影，前排自左至右为：代克(W.A.Neilson&A.H.Thorndike)合编的《英国文学史》。其中引有一段 W.Hazlitt 对莎剧《哈姆雷特》中这位主角的评论，这段文字十分精彩。恩师对我说：“下周见面时，你要能背得，我们一道来背。”我还记得，恩师和我在重大大校外到磁器口雨后泥泞的公路上，共同边走边背哈兹里特这段评论的情景。(50年代初重庆大学大校门外的公路两旁还完全是一片田野，而且平时行人也很稀少。)恩师十分重视学习外语要能背诵一些名篇佳作。也还记得60年代初我给他当助手时，恩师要我背诵一些莎剧中的著名段落，而且要把留声唱片借来，边听边摹仿，直到能脱口而出，与唱片中的速度、音调都相差无几。因此后来我也学着恩师教我的方法，要求我的学生能把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背下来。我也曾不时向学生进行背诵示范，以示怀念和不

文学史》。其中引有一段 W.Hazlitt 对莎剧《哈姆雷特》中这位主角的评论，这段文字十分精彩。恩师对我说：“下周见面时，你要能背得，我们一道来背。”我还记得，恩师和我在重大大校外到磁器口雨后泥泞的公路上，共同边走边背哈兹里特这段评论的情景。(50年代初重庆大学大校门外的公路两旁还完全是一片田野，而且平时行人也很稀少。)恩师十分重视学习外语要能背诵一些名篇佳作。也还记得60年代初我给他当助手时，恩师要我背诵一些莎剧中的著名段落，而且要把留声唱片借来，边听边摹仿，直到能脱口而出，与唱片中的速度、音调都相差无几。因此后来我也学着恩师教我的方法，要求我的学生能把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背下来。我也曾不时向学生进行背诵示范，以示怀念和不

忘当年恩师对我的教诲。我十分庆幸自己刚步入高等学府就能得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热爱后生的全国知名的大教授的关怀和教导,使我在对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学习中受益匪浅,这对我后来能坚持学习英语,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重大外文系调整到成都四川大学外文系。当时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恩师,然而这是大势使然。1952年9月,我只好向恩师告别,希望恩师今后仍然能对我继续施教。当时恩师不仅接受了我的请求,而且还热情地给我以鼓励,勉我继续努力,坚持不懈学好英语。在离开恩师后的那段日子中,凡我读书中遇到疑难,百思不得其解时,我就通过书信将问题寄呈恩师,恩师则仍一如既往对我授业、解惑。记得1954年“学苏联”,中学的英语课几乎已经全部停开。我虽然坚持学英语到毕业,由于没有英语课可教,我只好利用我所学的二外俄语去工作。因此,川大毕业后,我被分到内江市的中学教俄语三年。但在此阶段中我仍始终未放弃对英国文学的学习。在我自学中遇到疑难处,我就用书信方式向恩师请教。记得有一次我用书信请教我读莎士比亚第52首十四行诗时遇到的疑难,我一共提出了7个问题。恩师对问题的解答十分认真仔细,在我提出的7个问题旁,全用毛笔沾红墨水,一笔不苟的写出他的解释来。7个问题中,只有第5个题他未作答。我当时猜想恩师意在要我自己去查大型工具书以求得解决,目的是要培养我使用大型工具书的能力。后来我果然找到了答案。(这份材料由于我夹在牛津版莎氏全集一书中,故未散失,因而我珍藏至今。)由此即可看出恩师是如何关爱青年学生的学习和他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也可看出恩师是一位多么高尚、伟大、诲人不倦的学者、良师。

1957年秋,国内一些大学又逐渐开始恢复了英语系。西南师范学院在1956年秋就恢复了英语系的招生。因此1957年9月我便从内江市高中调来西师外语系教英语,从事自己的专业本行工作,这下我又回到了多年思念的恩师的身边,其乐可知。60年代初,上级要求为一些老专家配备助手,恩师是其中之一,他遂向领导提出拟要我充任他的助手,遂得以专门从其进修英国文学史及英国浪漫派诗歌,与恩师朝夕过从,聆听教诲。恩师教学的严谨、认真,对学生的关爱督促,和他为我付出的辛劳,令我终生没齿难忘。从我现在手边珍藏的恩师当年为教我一人而写的教学提纲,就是最好不过的明证。(指恩师所写关于拜伦、雪莱、济慈三位浪漫派诗人的讲

课提纲。)

记得1982年著名学者许国璋教授来我系讲学时,他曾满怀深情的对我说:“像吴宓老师这样的知名学者、教授,本应在京沪的大学任教,这都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他才一直呆在西南,留在你们的学校。你随时向他请教,真是有福气啊!”

我对恩师的回忆,永远也写不完。如今每当我经过西师校园内文化村老一舍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放慢脚步或停了下来,怀着无限怅望的心情,遥望着—舍底楼右手边那间斗室的门窗。我多么渴望能透过那扇窗子,再看一眼当年那位不论酷暑严寒或夜深人静时,常静坐在书案前,勤恳工作、一丝不苟、粗食布衣、孜孜不倦、潜心治学、头早秃、鬓已斑的我的恩师啊!我多么渴望能再听一次他满怀激情地放声背诵出梁任公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中的名句啊!哪怕只能再听一句也好啊!可是今天不行了,永远也办不到了,恩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二十个年头了,他已一去不复返了!可是他那伟大哲人、学者的不朽精神,和他那高风亮节、为人师表的崇高典范,定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开拓、继续进取,去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生!

恩师生前对他的工作、生活、为人、处世,曾有过如下一段自我评定:

“宓解放后的生活、工作态度,一贯是真诚坦白,热心积极,生活仍就勤俭,努力工作。对工作及一切事均负责。劳动(听候命令)积极参加;游行等事,自动参加;政治学习,一贯早到,不缺席,必定先读了指定的文件,且勇于做出我明知不免错误之发言。(凡此皆由宓一贯之性格及习惯:从前如此,今仍如此,不敢说是‘进步’,但绝不是‘伪装进步’,因宓少年、壮年亦从无虚伪做作,勾心斗角,设计图谋,以及计较名、利、忌嫉又贪欲之习惯也。)”

从上面恩师的这段自我评定,用来对照一下近年来个别人在他们的书中对吴宓先生的描绘,就不难看出,他们是在侮辱先生的人格,捏造历史,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历史岂容几个欺世盗名之徒,利令智昏之辈随意歪曲篡改和捏造呢?历史是无情的。今天歪曲历史的人,明天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他们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选自《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王泉根主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2月)

(责任编辑:郝龙)

我的自传

(下)

□ 文 蒋同庆



蒋同庆教授(前排右四)与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老师合影

(四)蚕桑品种基因库的开发

我在日本九州帝大,几度住在蚕室,饲养实验蚕儿。耳濡目染,均系来自世界各地教学科研材料家蚕品种的基因库内容。他们采用科学记录,巨细不遗,十余人长年累月的勤奋工作,保育品种。田岛弥太郎博士,那时即和我在同一间蚕室育蚕。后来他在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他建立了家蚕基因库。我对基因库重要性的认识,由此弥坚。返国以后,1939年浙大农学院院长蔡帮华教授,自广西宜山电函至时在桂林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我,文曰:“恳请屈就浙大农学院蚕桑系副教授”,但同时中山大学蚕桑系主任杨邦杰教授,也来函邀我去中山大学蚕桑系任教,双方名义,待遇均皆相等,虽然浙大距我原籍江苏较近,但我还是选择了中大,有丰富的家蚕品种基因库,是国家重要的生物资源,对教学科研,具有无比的作用。而我接管桂应祥教授这些家蚕品种,都是在广州沦陷以后,有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去沦陷区抢救出来;在河内工作站,也有同志为此以身殉职,客死异邦。这就表示这些品种,都是来之不易的国家财富。对此杨邦杰教授,坐镇中大蚕桑系,我则和当时助教唐维六教授,从河内工作站,经湖南宣章中大农学院,旋设桂林工作站,故钱立民技术员亦到那里,继后又去来阳工作站(湖南),我

们共同竭力,为保育这些家蚕品种,均付出艰苦辛勤的劳动代价,才将这些品种保育下来。我以此项工作的重要与艰巨,故当我几次转换院校任教,由中山大学去云南大学,由云南大学去四川大学,由四川大学回云南大学,由云南大学去四川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每次转换院校的先决条件,都要他们实际负责的领导首先同意,配给专职助教技术人员和足够的经费,能保育品种。保证教学科研材料的源源供应。具有这些条件,我才接受应聘。所有这些条件,先后都获得当时实际负责人的接受与支持。如果没有他们当时的大力支持,家蚕品种基因库,决不会得有今天的丰盛内容。所以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张福延教授,四川大学蚕桑系主任故王道容教授,乐山技专校长故郑愈教授,及继任校委员会主任唐世鉴教授等以及西南农大先后领导同志,他们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院校,而均同样的大力支持,提供足够的人员与经费,保育这些家蚕品种,支持基因库工作,使国家生物资源的保育与开发,持至今日。抚今思昔,其功均皆不可磨灭,并此附志。

(五)科研论著与历年成果

我发表的论文,除第3节和国内外交流部分外,国内方面,我在劳农学院读书时,选任为学生会农业部长,出版刊物,发表过《苏北涟水县的养蚕》,虽系处女作,但已绝版;1933年在当时中国农学界唯一的正式刊物,《中华农学会报》第120及121两期,连续发表《蚕

业统制论》上下篇,约1万多字;但抗战期间,《中华农学会报》停刊,改版出《中华农学会通讯》,我在1945年《中华农学会通讯》第50号,发表论文《家蚕黑翅蛹之遗传学的研究》等3篇,1941年中华农学会第26届年会上,发表书面论文11篇,其他1942、1943、1944年在中山大学《农声》,发表论文3篇,在江苏蚕农学会等五个团体联合年会上,我宣读并油印发表《家蚕卵色遗传学的研究:1、白色卵的研究;2、红色卵的研究》。1942年在《广东农业》第三卷七八期合刊,发表《家蚕第二联群Pm-Re两因子间的组换价》。1942年在《广东农业》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有《广东蚕桑统水引缩卵之遗传学的研究》一篇。

继在昆明云南大学的论著,前已述及。

解放以后,1952年院系调整,来到西南农学院,除教学外,兼任西南蚕丝公司技术顾问,以北碚蚕种场原种部为核心,在成都及云南草坝,一举建立西南区家蚕品种选种站三所。西南区选种成为中国家蚕育种第一个树立科学体系进行直系淘汰与旁系检定,分工合作的综合性选种,把西南区在解放初期解放前各自为政,适用品系良莠不齐,裸蛹破风茧有孔茧丛生的混乱品系改朝换代,选出华十镇、瀛文禾、瀛文本三品系,统一推广,把裸蛹、破风横行、颗粒无收的恶劣局面,完全消除,使华十镇品种统制三十年,瀛文后经南充继续选育改名川一,仍与华十对交,也达三十年之久。1965年在西南农学院发表《中苏家蚕品种交杂比较试验》,全文印出,拟和国外交换,而整风反右错划右派,故印而未发。直到1960年第3季度摘掉右派帽子,才又进行教学科研工作,和中国农科院蚕业研究所合作,该所出钱我系出人,进行家蚕人工引变科研工作新技术研究,这是我1936年在日本所学内容,1963年即对家蚕人工引变结果,发表论文4篇,其中3篇在西南桑树部分及进行桑苗带叶扦插,获得有益成果,上报学系。兹将上列论文著作,主要部分列成总表如次。表中总计,已印刷出版的书籍著作蚕体遗传学及学术论文等约60篇,两共约50余万字,翻译已印刷出版的《基础遗传学》、《田岛家蚕遗传学》(英日文各半)、《昆虫的成长与发育》、《养蚕》等约100多万字。编印出版《蚕学通讯》三年十期约100多万字;翻译田中家《蚕遗传学》(油印)、《蚕丝业副产物及综合利用》以及其他英日书籍论文(未印的)约100多万字,总计约350多万字,其文献散失无法收集到者,尚不在内。

(六)主要成果拾零与今后

接受中山大学品系里面基因库所保存的品种,以形态形质为多,故抗战时期发表的论文,多系形态形质遗传的实验遗传学范围。例如卵的黑色卵、红色卵及生种红卵、白卵、橙色卵、橘色卵及卵形的水引缩卵等,均系家蚕自然突变型。总计红色卵有两系,橙色卵亦有两系,均自毫无血统关系、不同品种所产生相同的自然突变型。这些卵色相互间杂交的遗传关系,是战争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斑纹、体色、体形、有龙角与茶斑、星斑的夸张基因,及黄皮与虎斑的连锁遗传和暗色斑与锈色茧的连锁,除黄皮蚕因当时共著者之一已故孙本忠技正不主张发表,其他均皆正式发表,无论论文的数量或质量,均系重要业绩,特别是其中“家蚕绢丝腺色素的研究”内容创见性更多。此稿系在中山大学桂林工作站时代,1942-1943年利用品种保育蛾区,分别抽选部分蚕儿,作为实验材料,逐步完成论文的。其上半篇当时发表于中山大学《农声》,下半部尚未登载,抗战烈火,燃烧到粤北湘南,农学院内撤,我也应云南大学农学院之聘,转移到昆明。故尔后以云南大学农学院《蚕桑科研究报告》第Ⅱ卷第1期名义,全文发表。附详尽的英文摘要。国内外均有交换,内容很为重要。例如:有关绢丝腺的没落,过去中外书籍一致认为:到蛹期退化消失,殁其踪影。但本文在黄红茧系许多品种,有色绢丝腺的材料,不但证明:蛹期直到蚕蛾老死,均能看到绢丝腺依然存在。因为绢丝腺占熟蚕体重40%,为幼虫成熟时最大器官。在生产实践上具有重大作用,我以绢丝腺的丝胶色素为目标,追踪到蛹蛾,证明绢丝腺虽然退化,但并未消失,更非无影无踪。把退化的绢丝腺,自殁其踪影的错误记载中找回来,订正了中外文献记载的错误。这非但对家蚕,而且对昆虫变态学,也具有创见性意义。其次,对蚕茧内外着色不同,作出正确的生理遗传学的解释。例如金黄茧系外层金黄色,内层白色。饴色茧系外层白色内层黄色。这些茧内外色素不同,对生丝品质商品价值,均有重大作用。影响制丝的颜色,降低生丝商品价值,至为不利。但本文发现中部绢丝腺着色部位不同,而产生茧层内外色素的差异。即当开始吐丝时,中部绢丝腺如果前区与中区弯曲部丝腺着色浓者,则茧层外部着色浓,内部着色淡,如金黄茧是也;反之在中区和后区曲折部丝胶着色浓者,则茧的外层白内层黄,如饴色茧是也。至于丝胶浓着色部,为何依绢丝腺部位而有差异,乃因前者丝胶开始着色的时候早,在五龄中期前,即开始着色,故着色部逐渐

前移到吐丝时,已达前中区的屈曲部位。而绢丝吐丝时即先着色,但吐到茧层内部,则浓着色丝胶已经吐完,故茧的内层成为白色。但饴色茧丝胶开始着色迟,在五龄中期后才开始着色,到熟蚕吐丝时,前中区绢丝腺,并未着色。当然先吐的茧丝没有色素,但后来吐丝到内层时,则中后部浓着色的丝胶,已经前进到中区与前区之间,才能吐出,故茧层内部着色,如饴色茧是也。这样依绢丝腺着色部前后不同,依五龄开始着色时间有早晚,而绢丝在熟蚕吐丝时着色部位有前后,遂生茧层内外着色的浓淡与否。查绢丝腺红黄色素的来源乃在绢丝腺中部绢丝腺的后区,均经确定。依这部分色素为目标,直到蚕蛾老死,都可看到绢丝腺色素分泌位置,是在中部丝腺的后区。依此色素为目标,而可找到家蚕绢丝腺的所在,并未消失。至少色素存在,是有影有踪,绝未消失,乃系千真万确,人人可见的事实。所有这些,无论在学术上及生产上,均很重要。直到抗战胜利,中日可以通邮,我拟将此篇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向日本九州帝大提出,函请故田中义磨教授征询意见。他函复赞许,我将该文约6万字,全部译成英文初稿,函送田中教授斧正时,而抗美援朝军兴,战事爆发,我在乐山技专抗援大会,宣告放弃学位申请,中止去函联系,获得掌声。1964年田岛在英国出版英文遗传学里,绢丝腺部分引用我这篇论文,但日本有些同学不明此事已经中止,未再继续申请,他们来函给我时,仍有称我为博士的插曲。

1978年,11届3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平反以后,开始建立家蚕遗传研究室,招收研究生,在家蚕形态遗传学卵色方面,做出总结性结果。因国外关于正常卵色之外,只有红色、褐色及白色卵三种类型;而我们研究室基因库,新发现的锈色卵、橙色卵(可可色)、杏黄卵、第五白卵(w-5)的红眼白卵等新突变型,均为国外所无,系我研究室独有的最新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把这些新突变型卵色相互间,与其他基因突变型相互间的遗传关系,大体均皆阐明。而且进一步应用生物化学最新的成就,第一个通过葡聚糖凝胶柱层析分子筛,把各种外表单一的着色卵,依色素粒的大小,筛选成各种单一色素,组成外表卵色。证明每一种外表单一的着色卵,实际都是由三种以上大小不同的色素粒,且色泽不同的色素,组成混合的外表单一卵色。从而每种外表单一的卵色,都系由不同的基因族共同组成。这些均经卵色实验遗传学及卵色生化遗传学双方证明,把卵色生化遗传学推到分子水平。所以在现阶段,有关家蚕卵色

的研究,无论实验遗传学、生化遗传学,我们研究室均居领先地位,今后这方面将继续充实。

今后另一任务,将系教学改革。主为教材内容的改革。这就涉及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环节等一系列问题。现行的教学大纲,乃系50年代以来学习苏联的产物。1954年我参加教育部第一次审定蚕桑专业教学大纲。那时苏联教学大纲,实际也由日本的内容转化,今天苏联农业在世界上已非领先地位。故日本现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更有重视的必要。它们现在和过去的相比,其教学内容主要表现在,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向学科纵深发展,而且加强横向联系,例如东京农工大学家蚕生物学科课程内容,主为四个讲座:

1. 蚕体生理学讲座,包括蚕的饲养及实习
2. 家蚕遗传学及发生学的讲座,另包括蚕种学
3. 桑树生理生态内包括栽桑学
4. 蚕桑生化学讲座

因为蚕学专业实际的主课是:以生理学导致养蚕,则生理为养蚕学之本,以遗传发生学导致蚕种,则是遗传发生为蚕种学之本,以生理生态学导致栽桑学,则生理生态学为栽桑之本。这样每一讲座,均有自己的理论,也有自己的实际。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既易讲授又易学习。至于蚕桑化学,乃系蚕学里面的动物、植物两方生理生化学的综合学科,既有生化学的共性,又有动物之蚕与植物之桑(柞、蓖麻)的个性。具有横向联系,且加深生理遗传双方向纵深发展的作用。所以日本现在的教学计划,内外联系紧密,科学合理,至值取法。至于其他课程,则均为关联学科。其中必修课有蚕病学及实验3学分;家蚕形态学实验1学分;选修课则有制丝学2学分;绢丝化学2学分;家蚕形态学2学分;桑树保护学2学分;桑树营养学2学分;蚕丝业政策2学分,还有畜产、园艺、作物栽培、农药、气象、机械化、农经农政等,作为关联学科的选修科目,所有这些课程,内容和我们现在的教学计划差距甚大。我们现在把关联学科性质的课程,也算作专业学科。例如桑树的病虫害学,蚕体解剖、制丝学均作为专业课开出,形成平均主义的课程,则专业课的比重增加,而失去专业内容的主次。这些都是今后急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准备先从栽桑学与遗传发生学开始,做出成果边做边学,再谈其他,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选自《蒋同庆教授业绩》,蒋同庆教授业绩编委会1990年10月)

(责任编辑:郝龙)

西南大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知名教

1956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1963年又有少数教师重新调资定级,现将学校五、六十年代的一、二、三、四级教授整理刊发:



一级教授(1人):

土化系侯光炯教授



二级教授(6人):

历史系(后转中文系)吴宓教授

副院长谢立惠教授

化学系郑兰华教授

土化系陈兆畦教授

土化系黄希素教授

副院长何文俊教授

授 名 录



三级教授(34人):

数学系李孝传教授、段调元教授、严栋开教授、张孝礼教授、郭坚白教授

农学系原颂周教授、王翊金教授、董蜀舫教授、管相桓教授、陈让卿教授

教育系普施泽教授、张敷荣教授、叶麀教授、罗蓉梓教授

历史系郭豫才教授、孙培良教授、李源澄教授(教务长)、邓子琴教授(1963年)

土化系陈祥教授、周同壁教授、易廷鑑教授

外语系赵维藩教授、方敬教授(教务长)

地理系盛叙功教授、赵廷鑑教授(1963年)

农经系蒋杰教授、叶谦吉教授

西南大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知名教

蚕桑系王道容教授、蒋同庆教授

中文系徐德庵教授(1963年)

生物系施白南教授

物理系尹以莹教授

园艺系董时厚教授

植保系蒋书楠教授



四级教授(30人):

教育系徐国桀教授、高振业教授、张清津教授、邓胥功教授、
陈东原教授、段喆人教授、任宝祥教授(1963年)

中文系魏兴南教授、赖以庄教授、刘又辛教授、杨欣安教授
(1963年)、耿振华教授(1963年)、何剑熏教授(1963年)

历史系杜钢百教授、吴毓江教授(1963年)

授 名 录

生物系戴蕃璠教授、唐世鑑教授

数学系王秀泉教授、袁炳南教授

化学系冯志东教授、陈行可教授

音乐系许可经教授、李滨荪教授

美术系(图制系)张宗禹教授、刘一层教授

外语系熊正伦教授

地理系王钟山教授

蚕桑系韩惠卿教授

土化系毛鸿恩教授

园艺系李友霖教授

(潘洵、蒋涛、张晓华、姚恒根据 1957 年、1963、1964 年学校教职员名册、教师名册、工资发放清册和部分人事档案整理。由于档案保存不完整,可能有个别遗漏,望知情者补充完善,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齐亮)

中共西南师范学院委员会
关于吴宓教授的平反决定

吴宓先生，字雨僧，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早年就读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美国，为哈佛大学文学硕士。1921年回国，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担任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到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文学。二十至三十年代，还主编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刊物。吴宓先生政治历史清楚，解放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西南师范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先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受到打击和专政。以年逾七十高龄，历尽种种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终于双目失明，双腿残废，亲属受到株连。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月，吴宓先生获准到原籍陕西泾阳养伤治病。但为时已晚，1978年1月17日，吴宓先生在陕西泾阳舍冤去世。

吴宓先生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1948年，他不肯到美国大学讲学，也不肯应香港大学之聘去讲授中国历史和哲学，更断然拒绝去台湾大学，坚决留在国内，迎接解放，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改造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并于1956年，将自己多年珍藏的系统完备的世界各国历史、世界各国文学书籍738册，逐册译出书名，加上作者简历，撰写内容提要，全部捐赠给西师图书馆，供广大师生阅读使用。吴宓先生通晓世界各

种语文，博览群书，知识丰富，治学严谨，勤奋刻苦，工作认真，一丝不苟，襟怀坦白，宣抒己见；在从事文化教育四十多年的工作中，对学生循循善诱，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教授，以及中、外语文教学人材，对祖国是有贡献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把吴宓教授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吴宓先生的一切罪名和污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1971年9月1日原西师革委会给吴宓先生作的错误结论，应予撤销，有关材料一律销毁，亲属受株连的，均予平反。

中共西南师范学院委员会
1979年6月6日

▲1979年中共西南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吴宓教授的平反决定

搜查中文系群众工作組鑒：十一月三十夜間之突擊搜查，解放軍有其人（似是中文系同學）却取去了：（一）1935至1937吳宓詩稿（十一月份函安來此之外，概不在此時此冊詩稿）（二）兩僧觀書二厚冊（多是早年之作）（三）多年友人所作詩集（四）一紙畫（可以分別四畫，有不合者，其畫下，其傳發還）三件。此三件，由認為無損滅之必要而對本人則甚珍貴。故特請求，系中將此三件發還給安。至深感幸。此致。敬禮。

1969年十二月三日上午 吳宓上

中共西南师范学院委员会

关于给吴 宓同志的平反意见

吴 宓，男，1904年生，陕西泾阳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教师，1950年参加工作，原任中文系教授、系务委员、院务委员、省政协委员，工资高级2级，1978年1月病逝。

吴 宓同志在1958年教育革命和1960年教改中，被认为“严重右倾”，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受到重点批判，1962年甄别不够彻底。现根据中央〔1979〕49号文件精神，经复查认为，1958年和1960年对吴宓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本人档案中形成的此类材料，一律取出销毁。

本人病逝 [] 中共西南师范学院委员会
 敬告 [] 署名。 1980年2月12日

▲1969年吴宓请求中文系归还其稿件

▲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关于吴宓的平反意见

以上资料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

(责任编辑：齐亮)

孟安明： 在小斑马鱼里 探索大世界

□文
周襄楠



2008年9月3日孟安明院士回母校讲学

编者按：孟安明，分子发育生物学家，1983年本科毕业于本校农学系，2007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孟安明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推动了我国动物发育生物学学科的发展，率先将当时国际最先进的DNA指纹技术引入我国畜禽遗传育种领域，建立了主要畜禽的DNA指纹图谱分析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孟安明为他的实验模式动物——斑马鱼专门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房间，在这个放了几万个海蓝色鱼缸的房间里，饲养着几万条斑马鱼，这种小鱼最长也不超过人的一个小拇指，身上有着浅浅的斑斓的花纹。正是以这种小小的鱼类的胚胎发育过程为研究对象，孟安明教授带领科研团队揭示了多个新基

因在脊椎动物胚胎的胚层和组织器官形成中的功能和作用机理。

1998年，孟安明从美国回到祖国，来到清华大学，白手起家组建了国内第一个以斑马鱼为模式动物的发育生物学实验室。9年时光转瞬即逝，孟安明以出色的成果证明了中国的学者在发育生物学方面的杰出研究能力。2007年，孟安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科研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

破解遗传基因在生命诞生和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机理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发育生物学就是这样一门探索生物体从精子和卵子的发生、受精、发育、生长直至衰老死亡的过程及其机理的学科，它需要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知识和技术的综合运用，富有挑战性，也是近年来世界上生命科学最活跃和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之一。

孟安明本科学的是农学，在英国的博士阶段专攻分子遗传，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又对发育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多学科的背景无疑让他在发育生物学领域具有很多优势。

斑马鱼是一种约3-5厘米的脊椎动物，它的许多基因及发育机制与人相似。一对斑马鱼每周可以配种产生上百枚胚胎，而且早期胚胎透明，都是在体外生长发育，通过显微镜，可以很好地观察到胚胎各个时期的发育过程，可操作性强，而且成本低，通过实验，就可以知道哪些基因在控制、影响斑马鱼的生长发育。

与生物学的一些其他分支不同，由于斑马鱼的性成熟周期是三个月，每天像人一样昼夜作息节律，这使得相应的研究工作必须配合动物的生活规律，而且胚胎的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需要研究者随时进行观察。

孟安明目前主要关注的是TGF β 、Wnt、FGF等信号通路中的介导因子和调节因子，了解它们对相关信号通路的作用机理，通过诱变、转基因等手段了解它们在胚胎发育的中胚层诱导、神经诱导、背腹分化等方面的功能，这可以为了解人类出生缺陷的分子机理提供借鉴数据。

孟安明领导的科研团队常常会做大量的细微到分子层面的实验，无论对实验难度还是对实验的量上面要求都很高。比如，要验证一种设想，需要设计多个实验方案，而每个实验方案都需要多次重复。“搞我们这种研究急不得，需要耐心和毅力，偶尔还需要半夜两点后观察胚胎的发育情况。”孟安明说。

正是以这种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精神，孟安明带领实验室的学生以斑马鱼为模式动物，建立了活体胚胎中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体系，阐明了多个新基因在脊椎动物胚胎的胚层和组织器官形成中的功能和作用机理，特别是在TGF β 信号对胚胎发育的调控作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2004年10月，孟安明与陈晔光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斑马鱼Dpr2通过



孟安明为专家讲解他对斑马鱼胚胎发育过程的研究。郭海军 摄

促进Nodal受体的降解抑制中胚层诱导作用》，阐述了在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一种动物胚胎发育调控的新机理，为揭示人的出生缺陷之谜提供了新思路。由于他在发育生物学方面的杰出成就，2007年，他被授予“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此外，在畜禽分子遗传育种领域，他最早将DNA指纹技术引入我

国，以其预测杂种优势和寻找蛋重的分子标记，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培养学生就要常和学生在一起

从每天早上8点多工作到晚上11点以后，没有节假日，孟安明几乎天天如此。

孟安明说，培养学生的诀窍无他，关键是要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和博士生一起查看、讨论重要的实验结果，和学生一起讨论他们的论文和实验的思路、方案，还有结果分析，孟安明尽可能地了解每个学生每一步

的研究进展。

他认为,教会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是培养学生科研素质的关键。在实验室定期举行的讨论会上,孟安明常常和学生们一起研讨别人已经发表的论文,有意识地启发学生从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中找出不足,鼓励他们建立起自己判断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常常对学生说的话是“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要验证一个科学的设想,如果能够想到的10种验证方案可以实现3种,就要去做3种,以验证这个设想的正确性。

“只采用一种方案去验证,然后把结果拿去草草发表论文,这样的行为我是不赞成的。”孟安明说。

除了学术研究,孟安明对学生的为人处世也是要求严格的。

“他们还都是孩子,跟我的小孩差不多大小,该批评就要批评,有毛病就一定要纠正,要有耐性,科学工作者不能只会做研究,还要会做人。”孟安明说。

除了培养博士生之外,孟安明常年担任生物系本科生专业选修课“发育生物学”的主讲教师,也讲授“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进展”等研究生课程。以“发育生物学”来说,这是一门更新速度非常快的学科,孟安明给学生选用的英文课本3-4年就要改版一次,为了讲好课堂上的45分钟,孟安明往往要在课前花几个小时查阅大量的文献和资料。由于对课程精心准备,他讲授的“发育生物学”已经成为生物系最受欢迎的专业课程之一。

科学家要有长远眼光和宽广胸怀

孟安明认为,做基础研究的目的,就是认识自然,破解基本的生命现象,从而为人类服务,这是科学家的责任。

“从根本想不到怎么应用的基础研究,到可以直接为人类服务的成熟技术,这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说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添砖加瓦的过程。我们做科研要有更加开阔、更加长远的眼光,不能

急功近利,否则就难以完成科学家基本的使命”,他说。

自孟安明在清华建立了第一个以斑马鱼为模式动物的发育生物学实验室之后,现在全国类似的实验室已经发展到20多个,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已经从“星星之火”开始有了“燎原之势”。一些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中国学者,看到发育生物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势头,都希望回国谋求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孟安明在科研取得出色成绩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效应”。

对于不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沟通与交流,孟安明显现了一个纯粹的科研工作者的胸襟。他认为,生命科学的探索工程浩大,单凭一己之力是难以攻克一些难题的,所以合作是一种必然。而合作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可以派学生去某个实验室参与研究,也可以让别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到自己的实验室来。

“如果有学者在看到我的论文之后,向我索要我实验当中的一些数据和材料,不管有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给他发过去。”孟安明说,“因为,我们实验室的工作能够开展到今天并且有一定的成就,其他实验室给予的合作与帮助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在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他认为,科学家要有大度的胸怀和开阔的眼光,尽个人所能推动科学的车轮前行。

(选自《中国教育报》2008年3月4日第9版)



2008年9月孟安明院士(前排左四)回母校时与校领导合影留念

(责任编辑:齐亮)

西南大学寻根(之一)

——川东师范学堂与乡村师范专修科的建立

□文/洪秋冰

编者按:时光如白驹过隙,眨眼间,西南大学从2005年组建成立至今,已走过了4个年头。回顾过去4年的点滴,我们甚感欣慰。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西南大学过去4年的成绩,与其悠久的办学历史是分不开的。西南大学的“根”,可以追溯到1906年的川东师范学堂。1930年,川东师范学堂更名为川东共立师范学校;1932年,在其内设立师范专修科;1933年,川东师范专修科改组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到1936年,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50年,学院与其他多个学院合并,分别组建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业学院;1985年两院又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至2005年终合并为西南大学。在战争频仍的年代里,川东师范学堂以及之后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为四川高等教育事业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如今,西南大学正沿革着其优良传统阔步前行。

追溯历史的根基与智慧,生成时代的觉醒和创新。不觉间,西南大学已走过了四个春秋。然而,年轻的生命难以承载历史之厚重,她需要追寻历史,回溯根源。那么,西南大学的“根”究竟在哪里呢?《西南大学记忆》将带您一同踏上西南大学“寻根之旅”。

翻开厚厚的档案,我们终于发现,西南大学真正的“源”,是1906年设立的川东师范学堂。然而在那战争频仍的年代里,川东师范学堂屡遭挫折,可谓命运多舛。

川东师范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川东道尹张振兹倡议创办,原定名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学生由川东所属三十六县选送,学校开支和学生用费均由各县根据该县官费生名额多寡申解,由各县教育行政长官合组维持会,以道尹为会长,为本校最高机关。因此她是川东三十六县培养师资的基地。当年即开办了简易师范科一班,一年毕业;次年开办三年制师范及附属小学。民国三年(1914年),学堂改名为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民国四年(1915年),学校添办二部师范一班,一年毕业。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校改行新学制,分前期师范和后期师范,都为三年制。后期师范又分文史、数理、博物、艺体四组。民国十七年(1928年),学校维持会呈请改组为校董会。但在维持会停止职权之后而校董会尚未成立之前,学校就因为经费“已陷入绝境”而面临停办的命运。在当时四川军阀防区割据的年代里,军阀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军事势力的扩张上,对教育不甚关心。因此实际上,教育经费并无可靠来源,许多学校都因为经费短缺而陷入绝境。川东师范学校也难逃经费拮据的厄运。川东三十六县经常因割据混战的时局而未能按时申解学款,学校“经费因以窘迫”而日益陷入“倾危情形”。到1927年,“本校经济窘迫,险象环生”,已濒于绝境。当时的军阀刘湘,经过争战,率部入驻重庆将防区扩大到下川东各县后,便着手整顿教育。“六路总指挥部鉴于本校已陷绝境,无人肯负钜艰,乃训令川东道甘绩镛兼代校长,办理结束”,^[1]拟将该校停办。在学校师生、校友以及社会人士的积极呼吁奔走下,同时,本热心教育的甘绩镛害怕停办学校会“造成大乱,给一切反对者以口实”,“因而提出整理内部、清理各县经费、改组维持会为校董会、以专责成等办法,使学校得以保留。”甘绩镛^[2]即以道尹兼任校长,对学校进行大力整顿,使学校“由一个破烂不堪、经费无着的学校”,变成了“设备比较完善、校舍比较壮观的花园学堂”。随着学校“外表内容大有可观,前因鉴于重庆文化落后,而本校毕业学生又多系寒酸,毕业后苦难升学;现时各县乡多率办初级中学,师资颇感缺乏。故为应环境需要起见,实有改办高师之必要。”^[3]于是,川东师范学堂适应社会需求,开始往发展为高级师范学校方向努力,并为此成立了“川东联合

县立师范学校改办高等师范筹备会”,即向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上书,呈请派专员参与筹备事宜。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准许派专员来协助川东师范筹备,但认为学校改名“高等师范”名实不符,着学校另拟妥名称上报教育厅立案。^[4]

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前期师范改为初级中学,后期师范仍旧,学校改名为“川东共立师范学校”。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川东共立师范学校迎来了她的一个新发展,即设立川东共立师范学校乡村师范专修科。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匪患遍地、自然灾害频发,广大农村遭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双重压榨,农业生产萎缩,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出“象牙塔”,深入农村探索“振兴农业”、“拯救农村”的道路。当时,著名乡村教育家晏阳初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只有开发农民的智慧,发展农村,才能使中国真正繁荣富强。民国十三年(1924年)以后,中国乡村师范教育兴起,全国南北各地闻风效法。民国十八年(1929年)“川乃继之而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政府就通令川东各县筹备设立或由初中改办。一时,川东各县靡然从风,争相创办乡村师范教育。然或因师资太少,办理者未免滥竽充数,或因办法未妥或则人力不足,以致各乡村师范教育未见实效,大都有名无实。政府为整顿所辖区域的乡村教育,开始设立本科为其储备师资,以应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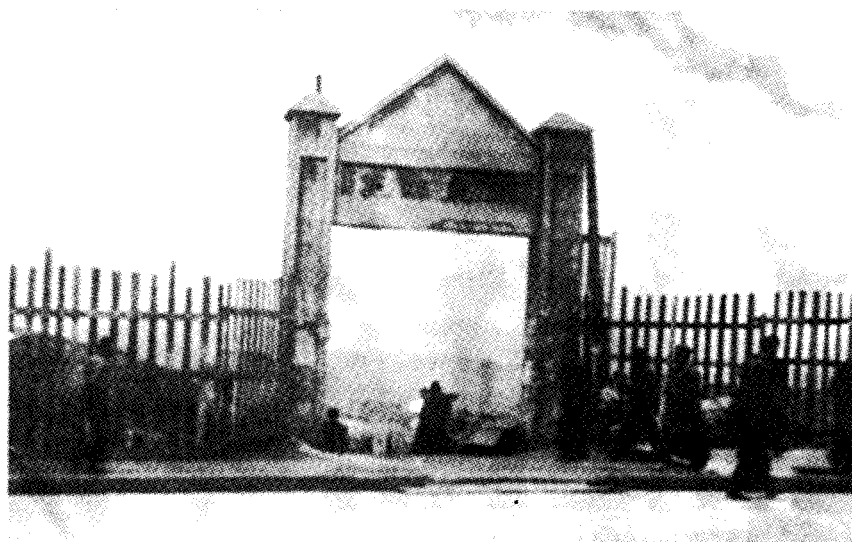


甘绩镛:川东师范学堂校长
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

际需要。初建时,因为经费拮据,并未固定规模,只设立了一个班,“乃由政府划归川东师范学校办理而附设于其中焉。”^[1]

民国二十一年(1932),川东公立师范学校“添办普通高级中学,并奉二十一军部命令,开办乡村师范专修科及中心农事试验场”^[6]。乡村师范专修科(由尚未与组织恢复联系的共产党员张俶任科主任)最终设立,她以“研究乡村问题,培养中级乡村师范之健全师资”^[7]为宗旨,二年制学制,“以新毕业的高中师范十七班学生为基础,凡愿升学者,全部升入新办的乡村师范专修科,又另招一些高中毕业生,准备将来扩大成为乡村建设学院”^[8]。当时共招收30人,设立一个班。继而,“又在学校门前租佃陈姓一大幅田地,开办农业试验场”,“购备各地优良牲畜苗木及农作物种子,一面作乡专学生实习之所,一面作为改进川省农业之准备。”^[9]请“陈让卿任试验场主任,陈希桓、刘主生、李贤堃为教师,准备将来成立中心农事试验场”^[10]。

在当时军阀混战,经费拮据无着的困境中,川东师范学堂得以保留并逐渐发展,无论对当时的四川高等教育还是现在的西南大学的发展来说,甚是幸事哉。尤其是乡村师范专修科的设立,对提升当时乡村教育水平,改善乡村教育状况,都大有裨益。



川东师范学堂旧址

注释:

[1]《川东省立师范学校二十二年度报告书 二十三年七月》,《本校校史及学校概况》,《原四川省立师范学校》,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 0129,目录号 1,卷号 37.

[2]甘绩镛又名甘典夔,四川荣昌人。他是四川全省工业学堂毕业生,毕业后在刘湘部工作。1928 年被刘委为川东道道尹公署道尹,1929 年道尹公署撤销,成立二十一军政务处,学校由政务处管理。1932 年,甘接任政务处长,兼川东师范校长。

[3]《关于本校改办高等师范学校的筹备会议记录及有关文件、岁入预算等》,《原四川省立师范学校》,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 0129,目录号 1,卷号 62.

[4]《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指令政字第九一四〇号》、《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指令政字第六八七二二号》、《四川东川道道尹公署指令第 300 号》,《原四川省立师范学校》,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 0129,目录号 1,卷号 62.

[5]《川东公立师范学校乡村师范专修科一览》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原四川省立师范学校》,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 0129,目录号 1,卷号 37.

[6]《川东省立师范学校二十二年度报告书 二十三年七月》,《本校校史及学校概况》,《原四川省立师范学校》,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 0129,目录号 1,卷号 37.

[7]《川东公立师范学校乡村师范专修科一览》,民国二十二年四月,《本校校史及学校概况》,《原四川省立师范学校》,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 0129,目录号 1,卷号 37.

[8]《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7 辑第 150 页.

[9]《川东省立师范学校二十二年度报告书 二十三年七月》,《本校校史及学校概况》,《原四川省立师范学校》,重庆市档案馆,全宗号 0129,目录号 1,卷号 37.

[10]《重庆文史资料》第 22 辑第 79 页.

(责任编辑:胡小京)

人与流年共长

——记校史中的部聘教授吴宓、胡小石

□整理 王娜

编者按：李叔同曾在其《晚晴集》里说过，“世之最可珍重者，莫过精神；世之最可宝贵者，莫过光阴。”然而时间亦是最能积淀的东西，大浪淘沙，留下的是亘古的永恒。光阴荏苒，追溯至1906年川东师范学堂，西南大学已走过了百年岁月，而这期间又积淀了多少精神！从她拥有的躬耕杏坛、传播知识的教师说起，吴宓和胡小石无疑是我们光辉的先驱。

部聘教授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实施的尊师重教、稳定队伍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指由国家教育部直接聘任的教授。^[1]一般用来特指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遴选的两批教授。教育部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部聘教授遴选程序有章可循，重视荐选的渠道和环节，力求公平公正；从严掌握人数和学科、宁缺毋滥，年龄不拘一格，大体上将公认的教学和科研杰出的教师选为部聘教授，他们不仅是高教界的佼佼者，而且是中国相关学科专业的顶尖人物。有人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由各大学各行各业的教授对本行投票推选，得票最多者被委任为教育部部聘教授。在大学任教10年以上，声誉卓越，对所在学科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成为部聘教授。部聘教授任期5年，可续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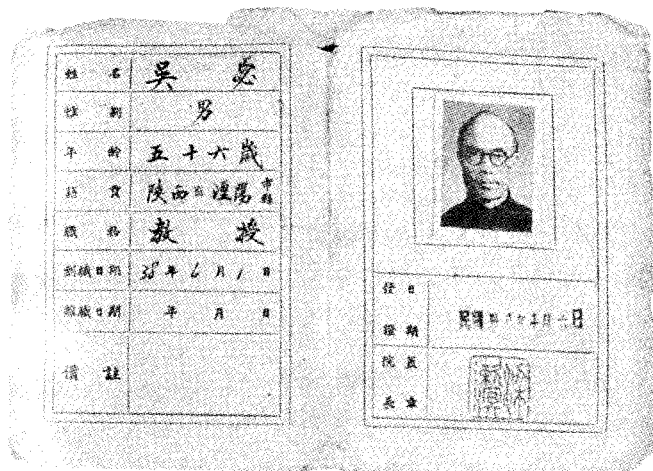
据记载1942年共评出29位部聘教授。^[2]1943年，又遴选了第二批15人。我校校史中的吴宓是首批部聘教授中的一位，胡小石也于1943年被聘为教育部第二批部聘教授。^[3]

每次经过宓园，心中总会涌起别样的敬慕，吴宓教授的雕像也总给人安详的感觉。吴宓(1894-1978)，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他毕生躬耕杏坛，倡导培养“博雅”之士，先后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执教，培养了吕叔湘、钱钟书、曹禺、季羨林等杰出人才。

1920年6月，年仅二十七岁的吴宓先生哈佛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21年6月，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动身回国。9月，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原南京高师)英语与英国文学教授。1924年4

月,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被裁并。8月,就任奉天(沈阳)东北大学英语教授。1925年1月,清华学校筹建大学部与研究院。2月赴北京,任清华研究院筹备主任,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研究院教授,联系时在德国的陈寅恪来清华任教授。1937年至1944年间,执教于西南联大。1942年,吴宓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

1949年4月底,吴宓婉拒台湾大学、清华大学等高



私立勉仁文学院教职员证

校邀请,飞往重庆到相辉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文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文学教授。勉仁文学院是一所私立学校,办学经费困难,教师薪金很少。但吴宓出于对梁漱溟的尊敬,不仅不计较,还曾自掏腰包赞助学校。

1950年4月相辉学院和勉仁文学院相继撤消,吴宓即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教。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其前身为1906年的川东师范学堂)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地点在磁器口。9月吴宓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

吴宓教授博雅汇通,当年,在西南师范学院,他先后担任过3个系的教授,先在外语系执教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然后在历史系讲授世界古代史,再到中文系主讲文言文导读与中国古代文学,这些课程差别之大,非古今中外皆通、文史言语俱精者,实不能胜任。除了给本科

上课外,吴宓教授还上过进修班的课,带过研究生。1955年吴宓被安排做了四川省政协委员、西南师范学院院务委员。次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调整和教师定级,在他的极力谦让下,他被评定为二级教授。

生活中的吴宓,也能给我们很多启示。他在西南师院任教期间,月薪272块5毛钱。有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孤苦伶仃的吴宓,他竟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钱作为答谢,吴宓还说,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不算多。又有一次中文系一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明一周内归还,一周过去了,却没有来还。吴宓找上门去,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吴宓却向人解释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为了西南师院的发展,1956年春,吴宓将他多年珍藏的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文的图书(其中不少早已绝版,在国外亦属珍本)共738册,特地从北京运来并亲自逐册用汉语译出书名,撰写该书内容提要以及作者简历,然后全部捐赠给西南师院图书馆。在此前后加上国内出版的图书,先生共捐赠了三千册图书给西南师院图书馆,丰富了西南师院图书馆的藏书,促进了西南师院教学和科研的发展。1956年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先生的心情极为兴奋,他认为党对他的关怀太多了,表示“愿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愿老死于西师”。1961年西南师范学院党委对吴



私立相辉学院大门

宓先生进行了甄别,对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粗暴批判先生的做法进行了道歉。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全校教职员大会,为吴宓在十年动乱中的冤屈平反,恢复名誉。(平反文件参见第39页)



胡小石

校史中另外一位部聘教授是日后自称“沙公”的胡小石。“沙公”的由来又与西南大学颇有渊源。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祖籍浙江嘉兴,1888年生于南京。父亲胡季石,晚清举人,长于古文和

书法。胡小石少承家学。1909年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该校曾先后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先生一生执教,曾在明智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西北大学、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1940年成立,西南师范学院前身之一,原校址在重庆白沙镇新桥)、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1943年,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高校也随之迁往后方。9月,胡小石举家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先生在重庆时,名望甚高,也与西南大学的前身结了缘。1940年9月20日,教育部在重庆江津白沙创办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新桥开学。校长由原教育部督学谢循初担任。1941年2月,应校长谢循初邀请,胡小石兼任该校教授,并移家至江津县白沙镇,自此,始以“沙公”、“沙”题款。胡先生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中文系系主任,教授诗歌、散文等。据胡小石教授的学生回忆,他讲授《楚辞》课,讲屈原《离骚》,旁征博引就讲了一个学期,记得《离骚》开头几句“帝高阳

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就讲了好几节课。讲到古代战车,他在黑板上画图,形象生动有趣。胡先生为学生上“唐诗”课,唐代诗歌本来就是中国文学中的瑰宝,加上胡老师的讲解,令人回味无穷,他还常说:“诗言志。好诗常意在言外,你们要多体会多体会!”加之先生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上课时的风采、板书、丰富的教学内容,均启发学生,有一股感染力。下课后,学生对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常舍不得擦去。^[5]

1945年,抗战结束,大局的变动引起了小局的变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因为“复员”问题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教育的风潮。所谓“复员”,当时是指抗战期间原由何处迁入大后方的机关团体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处。凡列入“复员”计划的,交通工具由政府统一安排;个人回家乡的也称为“复员”,但那个时候个人挤购车船票,难于上青天,所以凡说“复员”还是主要指机关团体学校而言。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抗战期间新办起来的,它的原址就是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本来没有“复员”问题。但当时全国师范学院,院名之上皆冠以省名或市名,只有两个是秃头不冠地名的,一是“国立师范学院”,通常简称“国师院”或“国师”,初在湖南蓝田,后在湖南南岳,钱钟书小说《围城》即以在蓝田时的该校为背景;另一个就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当时如此命名,似有意要以此二校为全国师范学院的首席次席,将来随着中央政府走,据说教育部某大员对女师学院学生作过这类的许诺。抗战胜利之后,女师学院招生,无论外省人本省人,一致切盼教育部兑现这个诺言。外省人切盼早日离开困守八年的四川,本省人大部分也切盼早日走出夔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大家希望新的院址靠近南京。不料教育部正式决定下来,女师学院迁是迁的,却只是迁到重庆附近的九龙坡(上海交通大学的战时校址)。^[6]胡小石先生因愤离任,重返南京,再回母校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曾公开拒任中央大学校长,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7]。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于1946年8月迁至重庆九龙坡(原上海交通大学校址),1950年与四川省立教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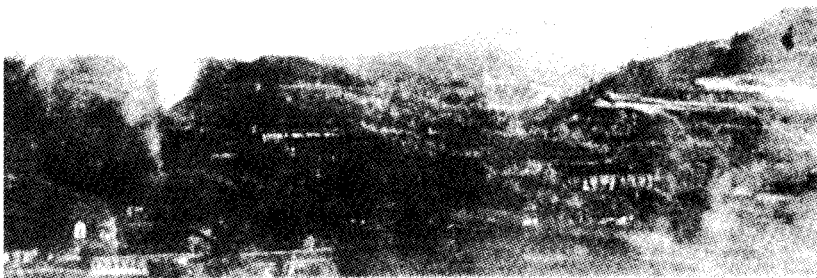
院合并组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

陈中凡曾赞誉胡小石先生：“讲授‘楚辞’、‘杜诗’等课程，从源流、体制，详述到修辞、音韵、风格各方面，阐发详尽，使听者无不佩服。对于书艺，能刻意求篆于金，神游三代，目无二李，遂形成独特风貌，无此功底者，只能望其项背而已，且其治甲骨卜辞，尤其足识。”据忆，胡小石先生讲授《楚辞》之盛况：大教室内，灯光明亮，座无虚席。胡小石身着长衫，手持长剑，缓步上台，掌声响成一片。先生站定，举剑曰：“剑，能陆断马牛，水击鹤雁，当敌力斩。自古名士多爱剑，屈原也不例外。”言罢，先生突然“嗖”地一下拔剑出鞘，剑锋寒光逼人。此时外面皓月当空，门厅与过道内，已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待到胡小石讲《唐诗》，又是另一番情景。胡门弟子、已故著名教授程千帆曾忆：一日，先生读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读着读着，便情不自禁地拿着书唱了起来，唱了一遍又一遍。五六遍之后，先生把书一掷，对诸生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先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予学生知识。^[8]

胡小石博学多识，为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戏剧，

无所不通，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早年所著《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取“一代有一代之胜”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演变，颇具卓识，后来的文学史家冯沅君、陆侃如、刘大杰的著述均受其启发。对楚辞之学，综合旧闻，择善而从，独创新说。著有《远游疏记》、《楚辞郭注义证》、《楚辞释名》、《离骚文例》、《屈原与古神话》、《楚辞札记》(未定稿)、《甲骨文例》、《读契札记》、《金文释例》、《齐楚古金表》、《声统表》、《广韵正续》、《说文部首疏证》、《江津方言志》等。书法著作，体系完备，论点精辟，除《书艺略论》外，尚有《中国书学史》未能完稿而卒。此外，论文、札记尚多。

吴宓、胡小石二位先生，以自己平凡而又独特的一生承载了这段历史。人与流年共长，他们传承的精神与文化将会一直激励着奋进中的西南大学勇敢向前！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旧址——重庆江津白沙“白沙山庄”

注 释：

- [1]《档案中所见的部聘教授》曹天忠，《学术研究》2007年第一期。
 [2]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届第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第一届部聘教授杨树达等二十九员一律应续聘(1947年7月25日)[A]. 核定及指派部聘教授(一)[Z]. 台北：“国史馆”教育部档，196/293-7.
 [3]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第1册,1936-1942)[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竺可桢. 竺可桢日记(第1册, 1936-1942)[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从明德女中到中央大学》，濮之珍，金陵文脉 <http://www.nanjing.gov.cn/culture/>.
 [6]《天荒地老忆青峰》，舒芜，《青峰学记》何荣昌，张承宗主编，江苏文史资料第52辑，苏州文史资料第21辑。
 [7]《胡小石(1888-1962):两江师范学堂1910年毕业 1943年教育部部聘教授》<http://seuaa.seu.edu.cn/s/14/t/33/a/2083/info.htm>.
 [8]《胡小石：师道亦风流》，林天宏，中国青年报，2006年07月05日。

(责任编辑：胡小京)

1959：梁漱溟西师之行

□文/刘重来

编者按：梁漱溟，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9月在重庆北碚创立勉仁国学专科学校，1948年改为勉仁文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汇集了众多文化精英。1953年，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被毛泽东批为“反动”，成为轰动一时的“公案”。

1959年春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借来重庆视察的机会，提早来到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拜谒吴宓等故交，倾吐“公案”心事。无论是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成为西南师范学院的一部分，还是梁漱溟1959年的西南师范学院一行，都成为西南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西南大学校史上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梁漱溟画像

1959年4月4日，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一位66岁的老人来到西南师范学院。他是谁？他就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



1942年梁漱溟50岁桂林留影

一、梁漱溟其人

说起梁漱溟，其实与西南大学也颇有干系。因为他在北碚金刚碑创建的私立勉仁文学院，于1950年高校院系调

整中并入西南师范学院，该校教师吴宓、邓子琴、李源澄、金陶斋、曹慕樊、黎涤玄等也随之来到西师。应该说，提到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记梁漱溟。

梁漱溟博学多识、忧国忧民，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积极探索。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建设入手，首先以教育来改造社会。他在三十年代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一度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他写的《乡村建设理论》等书，也被誉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作。

抗战期间，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而奔走呼号。抗战胜利后，又为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独裁而仗义执言。他曾两赴延安，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彻夜交谈。

在他身处逆境时,铁骨铮铮,敢于坚持真理。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公开反对批孔,更反对把批林与批孔相提并论。在受到围攻,挨批达百次之后,仍大义凛然,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他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卓有建树,尤精通儒家思想,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二、梁漱溟怎么会来西师

众所周知,1953年9月,梁漱溟因在全国政协会上关于农民和乡村问题的发言,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批判梁漱溟的发言是“反对总路线”,是“破坏工农联盟”,并声色俱厉,痛斥梁漱溟: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梁漱溟反动透顶!”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①

当时梁漱溟也不甘示弱,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在大会上公开反驳。然而梁漱溟毕竟是单枪匹马,寡不敌众,很快就“败”下阵来。有人把梁挨毛批之公案称之为“伟人

压倒圣人”^②。自此梁漱溟和毛泽东几十年的交情结束,而梁漱溟则请了长假,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在政坛上销声匿迹。

然而为什么5年多以后的1959年4月,梁漱溟会来到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呢?原来当年毛泽东虽然在全国政协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上严厉批判梁漱溟,但同时又对梁说:“等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其理由,毛泽东也直言不讳:“梁

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③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仍主张保留梁漱溟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就是让他起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果然事后梁漱溟全国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

既然梁漱溟仍是全国政协委员,那么全国政协安排的活动自然也要他参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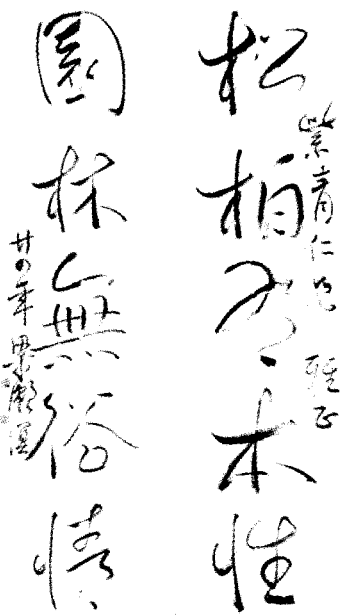
1959年4月,全国政协安排了一次到重庆视察的活动,梁漱溟是其中之一员。4月4日,梁漱溟随视察小组来到了重庆北碚。他急于想借此机会到西南师范学院寻访他原在勉仁文学院的亲朋好友。所以,在正式视察活动开始前,他来到了西南师范学院。

三、约见吴宓,倾诉挨批公案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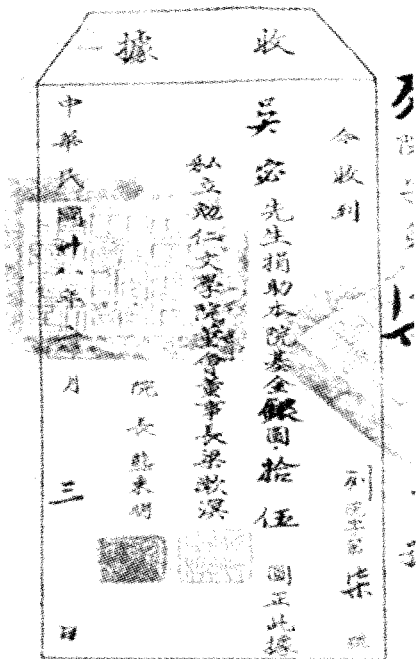
梁漱溟到了西南师院,先到了他的侄女梁培志家。梁培志的丈夫黎涤玄,原是勉仁文学院的教师,到西师后在历史系任教。梁漱溟在梁培志家坐定不久,便打发梁培志约吴宓来见。吴宓听说梁漱溟来了,喜出望外,自梁漱溟1950年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后,已有近10年未见,他多么想见这位他尊敬的老友,所以急忙来到黎涤玄家中与梁漱溟见面。

为什么梁漱溟要见吴宓,并作倾心之谈呢?原来梁漱溟与吴宓既是多年知交,又曾是一校同事,彼此十分敬重。1925年吴宓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任研究院教授,一时传为学界美谈。此年梁漱溟正在北京与熊十力一起进行私人讲学,自然对吴宓有所闻知。而吴宓在中西文学比较、外国文学、中西文化交流、《红楼梦》研究等方面的造诣,也使梁漱溟对他十分钦佩。所以1949年吴宓宁愿放弃赴美讲学之邀,推却台湾、香港高校之聘,而应梁漱溟之邀到勉仁文学院任教。

从1949年5月到1950年1月,两人同在一校,过从甚密,相敬相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勉仁文学院是一所私立学校,办学经费困难,教师薪金很少。但吴宓出于对梁漱溟的尊敬,不仅不计较,而且还曾自掏腰包赞助学校。在《吴宓日记续编》第1集的扉页上,就



梁漱溟书法对联



吴宓捐助勉仁文学院基金收据

印有一张 1949 年 6 月 3 日吴宓向勉仁文学院捐助基金 15 块银元的收条，上面还有勉仁文学院董事会董事长梁漱溟，院长熊东明的签章。但 1953 年那桩公案发生后，吴宓虽有所闻，但传说不一，甚至有传梁被批为“洋奴买办”之事，让吴宓十分担忧，所以两人一见面，话题自然就首先集中于此。吴

报》上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印发给全体委员。其内容是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欲“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梁漱溟竟然“吁请勿以大军渡江”，这是何等的反动，自然引起了公愤，梁漱溟成众矢之的在所难免。实际上梁在同一天的《大公报》上也登有《告中国国民党》^⑤一文，文中指责国民党之在高位者都要为过去发动内战负责，应引咎下野，听候国人制裁，但这一文当时却没有印发。

4、虽然当时对梁“判定‘交政协常务委员会处理’”云云，但亦迄未惩处，一切优待如旧，其事止如此”。吴宓所言“世传不可信”即指梁遭严厉惩处之传闻。如吴宓听说梁被判为“洋奴买办”，应该说就是讹传，但不明真相的吴宓则为此“极为愤愤不平”。

5、在这场公案中，毛泽东用过过于激烈的言词抨击梁漱溟，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远。诚如梁漱溟所言，这场公案“十分不利于广开言路，特别是不利于领导党听取来自党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⑥，这确实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对这桩公案，梁漱溟对吴宓是“详述”，而吴宓所记则过于简略，也许是吴宓考虑到此事极为敏感，不便记得太详细明白（如以“极峰”代称毛泽东就是一例）。但无论如何，毕竟这是那桩公案发生 5 年多以后梁漱溟向老朋友陈述的一个真实记载，仍是弥足珍贵的。

宓当天在日记中记述了二人的谈话：

宓（吴宓自称）表示对漱公（吴宓对梁漱溟的尊称）被判为“洋奴买办”极为愤愤不平，请问颠末。漱公乃详述 1953 年 9 月全国政协委员学习总路线时，在小组发言，述所见所知，藉供当局参考，而被认为“反对总路线”。漱公一再力辩其无此意，致触极峰之怒，遂以漱公 1949 年四五月吁请勿以大军渡长江之电，印发政协全体委员，命讨论“漱公凡遇共党之大设施，辄出而反对”，其是非若何？于是会中纷纷责斥漱公，判定“交政协常务委员会处理”云云。但亦迄未惩处，一切优待如旧。其事止如此，世传不可信也。^④

从《吴宓日记续编》所记梁漱溟的陈述可以看出：

1、梁漱溟对吴宓是毫无保留地“详述”了这桩公案，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这和梁 1953 年 10 月呈毛泽东的检查不尽相同。

2、梁漱溟仍坚不承认自己的发言是“反对总路线”，并“一再力辩其无此意”，“致触极峰之怒”。这里，吴宓用“极峰”代指毛泽东，颇耐人寻味。

3、为了证实梁漱溟“一贯反动”，“凡遇共党之大设施，辄出而反对”，以激起众怒，毛泽东采用揭梁漱溟所谓历史老底子的方法，将梁漱溟 1949 年 4 月在《大公

四、关心勉仁文学院的故旧

梁漱溟来到西师后，十分关心原勉仁文学院的故旧好友。他问起了李源澄，十分慨叹。李源澄是一位颇具才气的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史林一株参天树”。刘又辛先生为他写的传中有记：

自幼聪明好学，1927 年考入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文学院院长是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蒙先生对他非常赏识，便着意予以培养，除自己严加指导外，还让他专门从廖季平先生研究经学，那时廖先生已经退休在家，专门为他讲授，因而得到研制经学的真传。以后，蒙先生又让他到苏州从章太炎先生治子史，又深受章氏嘉许。李源澄先生在这三位大师的引导下好学深思，渐渐形成了他做学问的个人风格，颇为当时人所称许。^⑦

梁漱溟对李的学问人品都很赞赏，所以他在创建勉仁文学院时，特请李到校任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务工作。然而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学者，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竟被打成右派分子。突如其来的打击，致使李源澄先生神经错乱以致癫狂而死，年仅48岁。梁到西师时，李已死去二年，未能见面，使梁感到十分遗憾和伤感。

在吴宓陪同下，梁漱溟又到历史系所在的第3教学楼去见邓子琴教授。邓子琴教授192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在文化史、宗教史、风俗史、民族史的研究上颇有成就。梁漱溟创办勉仁文学院后，也聘他来校任教，老友相见，格外亲热。

后在吴宓、邓子琴陪同下，梁漱溟又来到西师办公大楼左侧的小凉亭上聊天。他们聊天的内容，据《吴宓日记》所记，一是梁漱溟表示，自己虽身处逆境，但吴宓

等友人“若到京访亲友，仍可欢叙”。也就是说，吴宓等友人到北京，大可不必顾虑，仍可找他欢谈；二是告之吴、邓，原勉仁文学院教授、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近况和在上海市的地址；三是谈及著名学者林宰平先生虽已“年八十二，犹健在”，而“罗莘田（常培）已歿”等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对西师校园景色大为赞赏。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就有“漱公叹赏本校山水风景及园林之美”的记载。

梁漱溟是一位伟人，1988年95岁高龄时去世，在他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有幅挽联是：“一代宗师海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⑧表达了人们对他的高度评价和崇敬心情。

梁漱溟1959年西南师范学院之行，为西南大学校史留下了难得的记忆。

注 释：

- ①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7~108页。
- ②袁阳：《浪漫的补天者——梁漱溟心路历程寻迹》，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 ③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 ④《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1959—1960），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4~65页。以下引此日记之文，不再另注。
- ⑤《大公报》所载题目是《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
- ⑥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 ⑦刘又辛：《史林一株参天树》，载《缙云山下一支歌》，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 ⑧《一代宗师海人不倦 一生磊落宁折不弯——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88年7月8日。



（责任编辑：胡小京）

吾 祈 吾 爱

□文/桃子

编者按：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也是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原西南师范学院建校初期的第一栋教学楼，始建于1952年，是一栋颇具韵味的典型苏式建筑。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留下了众多名家大师睿智深沉的思考，承载了无数西大学子孜孜以求的梦想。2008年7月31日，第一教学楼在维修施工中不慎失火，学校师生及校友深表怀念。所幸，在学校领导的关怀下，目前，第一教学楼正在按原貌积极筹建中……



第一教学楼原貌

有人说，一座房子有了感人的故事，一栋建筑有了历史的沉淀，那就不能单单称其为建筑了。西南大学第一教学楼正是这样。第一教学楼始建于1952年，56年间，经历了十余次保护性翻修。2003年，古朴典雅的第一教学楼成为文学院办公、教学的主要用楼。第一教学楼之所以被师生们亲切地喻为“精神家园”，不仅在于她是西南大学的第一栋教学楼，更在于她曾留下过众多文人大师的足迹，孕育了无数青年才俊。从这栋教学楼里走出的名家大师不胜枚举，已故国学大师吴宓就曾在此楼任教多年。这栋与“仁爱、博雅”教育相伴相随，历经半世纪沧桑却依然书香弥漫的教学楼，无论遭遇无情的大火，还是历尽岁月的消磨，都不会在人们的记忆中褪色。望着它渐渐消散的背影，我们心中流淌着无限的怀念和期许……

第一教学楼失火，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密切关注。假期离校的同学和许多校友得知这一消息后，忧心如焚，纷纷打电话或通过网络焦急地询问。大火尚在扑救时，师生们就已经在讨论重建问题。文学院一位在场的辅导员认为最好能按原样复建，但要采用坚固防火的替代材料，师生中持此种观点的人较多。另有部分人提出用新修科技楼三四层作为文学院驻地，在原址上修建小型纪念馆。失火当天，师生员工还纷纷聚集于西南大学校园网络的樟树林论坛贴图专区、校园快讯、文学院专区等，关注此次失火情况，纪念、追忆第一教学楼的文章与诗作，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是什么样的思绪在漫步校园时悄悄泛起，随即那一点牵挂便涨满了整个心房？是什么样的感动在一个毫不相关的瞬间突然掠过心头，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回

忆?是老师充满激情的声音,是同学一起探求新知的笑容,是常年翠绿盘旋而上的爬山虎,是深秋金黄满地的银杏,是我们在阳光下草坪上静静思考的画面……这些全部沉淀在第一教学楼古典优雅的窗格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岁月一起慢慢变得深沉耐读。”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动情地说:‘诗是对家园的无限怀想,哲学是对精神故乡的不停追寻。’第一教学楼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充满诗意,渗透哲理。”

——“我喜欢第一教学楼里那一幅幅书法,课间休息,不经意间的一瞥你会发现眼前的每一幅字都是一种经典,它们独特的气质和那沉静的美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喜欢第一教学楼满墙的爬山虎,细雨绵绵,听着古朴的旋律,望着窗外那一片片因时而变的叶子,我恍然体味到悲悯的情怀,内心不由得涌起阵阵情愫;

我喜欢第一教学楼里那一张张陈旧的书桌,紫红的颜色在消退,裸露的红木让你感受到历史的低吟,体味到熟悉的温暖和感动,求知的气息亘古不变;

我喜欢第一教学楼门前端坐的鲁迅,内敛的吴宓,你能感觉到青铜像背后所代表的那些或悲壮或辉煌的年代,他们是历史的印证,是文学后继者对历史的缅怀和对昔日先贤的追忆;

我喜欢第一教学楼门前那两株充满诗意的银杏树,无论哪个季节,无论哪个角度,你都能在树下发现精致的美丽。”

——“快毕业了,暑假离开学校前还想着,等秋天到了,银杏纷飞的时候,一定要用相机把学校里最美的这个瞬间这个地方永远地收藏。却不想,离开前匆匆的一瞬回望,竟成永诀,怎不叫人痛心!”

——“日日经过的吴宓路,已看不到曾经的第一教学楼那碧瓦青砖在阳光下闪烁古朴而优雅的光芒了。能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砾,记载着逝去的往事,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工人们起早贪黑地忙着处理这片残垣断壁,只为尽快重建文学的家园。就让我们把忧愁镶嵌在那灰绿色的残垣,让她的处变不惊盖住我们的忧伤,让她的美丽风姿镌刻在永久的记忆中。”

——“我们心中的第一教学楼,是一

颗璀璨的明珠,美得肆无忌惮,美得忘乎所以;是一处悸动的归宿,让人浮想联翩,让人流连忘返。”

——“追忆那时书生意气的我们在第一教学楼的宓园里迎接春日的晨曦;追忆那时花样年华的我们在第一教学楼的情影下诉说秋日的私语;追忆夏日的午后,我们在第一教学楼的讲台上放飞梦想点燃青春的激情;追忆冬日的黄昏,我们在第一教学楼的窗台边感悟人生送走天边的夕阳。”

——“暑假之日,酷暑炎炎。惊悉第一教学楼罹火灾之祸,忧思万端。身处蜀中,心实念渝州。憾天不佑我百年学府,竟致此灾。来校后,见残垣支离,念及两载前初至此地,见苍梧环抱,垂柳依依,而此时已作湮灭,更兼阴雨不开,秋风凄然,乃泫然涕下矣。”

……

玉落花间碎,只留心还醉。所有西南大学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第一教学楼的深情与缅怀。我们难以忘怀在第一教学楼的书桌前,品读待月西厢下的神韵与感怀;难以忘怀在第一教学楼的楼前,捡起一片泛黄的银杏树叶,追忆不朽的哲人与先贤;难以忘怀在第一教学楼的每一个教室,沐浴“仁爱、博雅”教育精神的思考与顿悟……第一教学楼的点点滴滴无不融入西南大学和西南大学人的记忆,我们殷殷希望第一教学楼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按原貌重建。

(根据韦俊、周妮、蔡剑斐、温和玲、杨凌峰等文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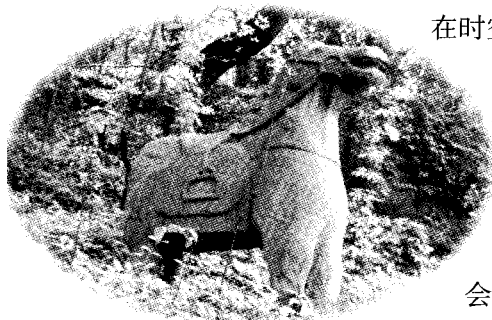


第一教学楼不慎失火

(责任编辑:胡小京)

被冷遇的石马

20世纪90年代,学校建造荟文楼,在拆除新中国成立前留下的地主庄园——熊家院时,挖掘出一批古代文物。学校把部分文物收藏起来,只单单



第三教学楼旁的石马

留下一匹石马置于校园中。

刚开始,学校还为石马搭了一座亭子遮风挡雨。不久,亭子便经不住风雨的磨砺,倒了下来,剩了石马卧倒在地。后来,石马被重新置于从前立足之地旁边的花坛上。又过了几年,石马被移到了路旁的石坎上。如今,石马孤零零地站在第三教学楼外,对着历史文化学院,似乎在说着它几移其身的沧桑经历。

石马不大,比真正的马小些,没有雄姿,低眉顺眼,普通而朴实,虽然出身久远的宋代,但若从艺术品角度看,雄姿神韵都欠火候,也够不上享受文物的“待遇”,也难怪它被学校这里移来那里挪去的。

石马就这样安静地站立在

绿树丛中,毫不张扬地在一点一滴流逝的岁月中呼吸,它时时被光线和阴影分割成不规则的画面,明明暗暗,深深浅浅,以一种不可名状的形态,守望在时空中。

来自久远时代的石马,以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身份,与身来影往的校园学子保持着亲密的接触。路过的学生,常常会随意地抚摸它一下,或是干脆骑在它身上摆个姿势,不论石马身处哪里,它都是永远的默不作声。虽然自从它出土后,就很少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许它还为自己这番经历庆幸:正是因为我不被作为文物的身份,才能与这里的学生们那样近距离地相处着,才能融入他们的校园生活。

对于石马,很多学生至今也不知道它是文物还是现代的雕塑。但是,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步入了社会,经历了纷扰繁多的红尘世事,当他们再次返校,看见石马依然如旧,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才知道,成为普通,是多么的享受。

一位当年的学生离校十三年,回到母校成了一名教师,面对石马,慨然赋诗《校园里的一匹石马》:

我和一匹宋代的石马/相遇在我的大学/十三年前我大学毕业/它刚刚出土/人们把它当作文物

给它修一座小小的草亭/遮住雨、太阳和风/让它保持历史的姿态/保持将军的尊严和气度

它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一座有文学、政治、历史的教学楼前/粗糙的石马昂着头/披着树影、灰尘和星光/就像那些教授的模样/我对着它肃然起敬/我对一切文物肃然起敬

十三年了,我离开宋代的马/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路上/跑了整整十三年东奔西突/像个战败的俘虏 落魄回家

我的马 宋代的石马/也倒在地上 草亭已灰飞烟灭/旁边是乒乓球台/对面依然是那些政治、历史和文学/然而 最可恨的是/两个无知的女生正丑丑地坐在/你的身上

石马 我的石马/你怎么可以和我一样倒下/想一想 一千年以前/你被雕刻的那个晚上/也许刀光剑影就在山下/但师傅的手肯定没有颤抖/你成为马了/你成为战士了/你和将军一样成为将军了/然而这正是你的不幸/那些杯子那些剑那些将军用过的信纸/甚至帐中的女子/都被豪华地珍藏着/而你被历史放逐/无名无姓 朝代模糊 英雄末路

啊 石马 你静静地躺着/我像那个师傅一样蹲下/轻轻地抚摩你/我要带着你回家/回到宋代 回到那座山上/变回一块石头/可以日晒雨淋的石头/可以沉默的大多数

(文稿摘自《漫游中国大学——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责任编辑:韦俊)

她的存在,是一个永久的惊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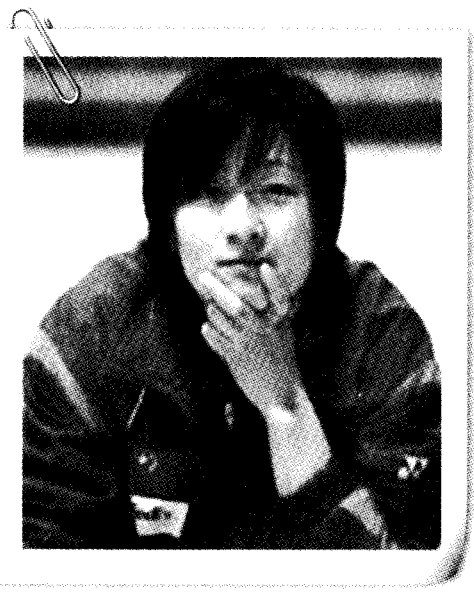
——记 2006 级运动训练专业张亚雯同学

□整理/周 妮

【编者按】张亚雯,西南大学体育学院 2006 级运动训练专业学生。作为一名平凡的女生,2008 年对她来说,却注定是不平凡的;作为一名国家队的羽毛球运动员,2008 奥运会对她来说,也将是永生难忘的。

北京时间 8 月 15 日 19 时,张亚雯和魏轶力夺得女子羽毛球双打项目季军,为中国赢得 2008 奥运会的第六枚铜牌。作为一名在读大学生,却又是世界羽毛球赛冠军、08 奥运会季军、“重庆直辖 10 年建设功臣”!在这些至高的荣誉、耀眼的光环背后,有过怎样的坚守与执著,有过怎样的欣愉与欢笑,又有过怎样的艰辛与泪水……“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只有全部付出了才对得起自己。”张亚雯以最简洁、最朴实的一句话给了我们响亮的答案。

《莘莘学子》栏目将陆续向您讲述西大优秀学子的精彩故事。



■ 姓 名:张亚雯

■ 籍 贯:重庆

■ 性 别:女

■ 生 日:1983.9.9

■ 身 高:1.62 米

■ 体 重:63 公斤

■ 项 目:羽毛球双打

运动经历

张亚雯 5 岁开始练球,1997 年入选国家队。2001 年正式进入中国羽毛球队。是中国羽毛球在双打项目上的后起之秀。

打法特点

右手执拍,头脑灵活、跑动积极,抢网速度快。

成长历程

1983 年 9 月 9 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女婴降生在重庆市万盛县南桐矿区的一个普通家庭。这个女孩的父母都是矿区工作人员——父亲是开矿区小火车的司机,母亲是矿区幼儿园的老师。那一刻谁也没有料想到,20 年后这个普通的小丫头,会以“张亚雯”的名字成为羽毛球世界冠军,为家乡和祖国争得荣誉。

算起来张亚雯开始打球的时间比较早,5 岁时,还在读学前班的张亚雯就被启蒙教练彭跃选中,开始了自己的羽毛球之路。那时,彭越的女儿正好在张亚雯妈妈所教的幼儿园读书。他在一次接女儿放学的时候碰到了张亚雯,简单的交谈后,就发现她是个羽毛球运动员的好苗子,决心要好好栽培。经多番劝说,一直不愿女儿耽误学业的妈妈也终于同意小亚雯以锻炼身体为目的,接受彭越教练的专业训练。谁知,这一决定也注定了羽毛球场上一颗新星的诞生,张亚雯从此开始了她 20 年的运动员生涯。

2006 年就读于西南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

主要成绩

2000 年世青赛女双、混双、团体冠军;

2004 年泰国公开赛女双冠军;

2005 年苏迪曼杯冠军成员,新加坡公开赛女双冠军,世锦赛混双亚军、女双季军,世界杯羽毛球赛混双冠军、女双亚军;

2006 年世锦赛女双亚军,印尼公开赛女双冠军,中国大师赛、中国公开赛、日本公开赛女双亚军,德国公开赛、全英公开赛、新加坡公开赛、澳门公开赛女双四强,香港公开赛、泰国公开赛女双八强;德国公开赛混双亚军,多哈亚运会女团冠军、混双亚军;

2007 年苏迪曼杯冠军成员,世锦赛女双四强,法国超级赛、新加坡超级赛、全英超级赛女双冠军,香港超级赛女双亚军,中国超级赛、日本超级赛、韩国超级赛女双四强,中国大师赛、印尼超级赛女双八强,澳门公开赛混双冠军;

2008 年尤伯杯冠军成员,瑞士超级赛女双亚军,印尼超级赛、全英超级赛、韩国超级赛女双四强。中国常州大师赛混双冠军,香港羽毛球赛混双女双双料冠军;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女双季军。

奥运之前的战役

北京时间4月18日,2008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进行了一场关键之战。这也是张亚雯在奥运前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在混双1/4决赛中,中国选手谢中博/张亚雯以1比2不敌印尼组合诺瓦/纳西尔,无缘半决赛的同时也彻底失去了北京奥运会混双参赛资格。

比赛前一个小时,谢中博和张亚雯就来到赛场进行热身。他们选择了那件给他们带来过很多幸运的红色T恤,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对手印尼组合也选择了同样的颜色,谢中博有些担心地跟张亚雯说:“肯定要让我们去换衣服。”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很幸运地没有更换比赛T恤,两对身着红色赛服的选手隔网相对。

从1/4决赛开始,亚锦赛开始提供转播信号,但是4块场地中只有1块场地的比赛进行转播,而这场混双的焦点之战正是被选中将进行转播的比赛。不过,国内要看到亚锦赛的转播必须等到半决赛。张亚雯有些遗憾地说:“如果从八强开始转就好了,进不了半决赛大家就看不到我了。”

谢中博/张亚雯的这场比赛是混双四场比赛中耗时最长的,在输掉第一局后,他们在第二局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将比分扳平。张亚雯赛后说:“这场比赛能打到三局,尤其是第二局,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能赢下来,确实不容易。”第三局,中国组合一直处于落后,最后输掉了比赛。

中国这对组合世界排名第五,要想获得奥运混双资格,必须超过排名第四的林培雷/玛丽莎。而要在积分上超过他们的条件非常苛刻:自己必须夺冠,同时印尼这对组合还不能进入决赛。因此,这次参赛谢张组合遭遇了空前巨大的压力。张亚雯说:“这次压力特别大,目的性特别强,所以会感觉无助一点。”

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张亚雯立即询问队友是否明天就能够回国。“明天星期六,周日休息一天,重新开始训练。”在失去了混双资格之后,张亚雯将专注于已经获得资格的女双比赛。



张亚雯(左)在接受训练

奥运赛场的记忆剪影

2008年8月15日晚,我校体育学院2006级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张亚雯与搭档魏轶力在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铜牌争夺战中直落两局,以21-17、21-10,总比分2-0战胜日本组合前田美顺/末纲聪子,夺得铜牌。这是中国羽毛球本届奥运会夺得的第一块奖牌。尽管只是铜牌,但对于重庆体育来说,却是书写了一页新的历史。

最后一记吊死日本队,张亚雯疯狂地跪在地上对天大吼,她的搭档魏轶力,则泪流满面地瘫倒在了比赛场上——在多哈亚运会夺取女团金牌和混双银牌的时候,张亚雯都没有如此忘情,而此刻仿佛是她终极宣泄,尽管这仅仅是一块铜牌。

“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到这块铜牌,不然我无法给我的城市、我的学校作出交代!”这是输掉半决赛那夜,张亚雯作出的承诺。兑现诺言之后,她又哭了,带着笑容的哭。她带着笑和泪说:“这场比赛打得很痛快,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场奥运会比赛,而且我知道,当我赢球的那一刻,重庆有三千万人在看我。我必须尽力,尽管只是一块铜牌,我希望我的城市、我的学校能够接受……”

谈到这块铜牌和这十几年的付出,张亚雯的笑变成了苦笑,她拼命地摇着头——或许这个动作才是她此刻心情的最真实写照。“铜牌怎么可能与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划等号?在我看来,只有奥运会金牌才对得起我这十几年,可惜……”不过对于重庆,她这块铜牌却等于新的历史:“我想,这块铜牌也算给重庆父老、学校老师这些年一直支持我的回报了,不过,我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好……”



张亚雯奥运赛场上的英姿

母校之行的温馨时刻

“我不会退役,会继续打下去,期待能为重庆拿到奥运金牌。”这是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铜牌得主、西南大学体育学院2006级学生张亚雯回到母校,与学弟学妹们畅谈奥运感受所说的。2008年9月9日,这天恰逢张亚雯25岁生日,交流会现场的400多名同学还为她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会后,张亚雯与学校的羽毛球爱好者进行了一场女子双打比赛。身为在读大学生,却

因满满的比赛行程和训练,张亚雯不得不经常脱离众人向往的大学生活,但是这次载誉而归,她感受到了母校师生的关爱、热情与自豪。

回校期间,张亚雯不厌其烦地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满足大家的好奇,分享自己的经验。当有小师妹向她抱怨刚刚开始军训生活时,她微笑着鼓励“不论是学生还是运动员,在自己的工作上都应该全力以赴



张亚雯(前排右二)奥运获奖后回母校之行

啊。”她说自己在训练中也有感到辛苦,感到身心俱疲的时候,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支持自己坚持下来了,“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只有全部付出了才对得起自己。”

西南大学9月7日作出表彰决定,决定给予我校体育学院2006级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季军张亚雯20000元的奖励。11月5日晚,以“励志、诚信、感恩”为主题的第二届助学文化节颁奖典礼上,张亚雯荣选“感动西南大学十大大学生人物”之一。虽然这些荣誉不及奥运奖牌的光环,却也是母校送给张亚雯最好的礼物。

沉静后的再次感动

2009年2月18日下午,2008年度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颁奖晚会在重庆市彩电中心演播厅隆重举行。国家羽毛球队运动员、我校学生张亚雯获此殊荣。张亚雯是年龄最小的获奖者,也是惟一一名女性获奖者。

2008年,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张亚雯经过努力拼搏,夺得了羽毛球女子双打铜牌,实现了重庆直辖十一年来奥运会上奖牌“零”的突破。在颁奖晚会上,张亚雯非常激动,她在感言中说:“从5岁开始,20年了,羽毛球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想在2008年奥运赛场上收获一枚金牌。但当8月21日,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我和搭档魏轶力都哭倒在了赛场,我们只收获了一块铜牌。25岁,正是羽毛球运动员的金色年龄,我却失去了自己的金色梦想。也许我该和羽毛球道别了,奥运一结束,我就把自己在国家队的部分物品寄回了万盛老家。没想到的是,一回重庆,家乡父老却用英雄的礼遇迎接我,市领导、体育局领导和万盛区领导都来看我,西南大学的老师同学还为我过了生日。在万盛,满街都是我的海报。走在路上,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对我说:‘张亚雯,好样的,你为重庆争了光’。好长时间,我被父老乡亲的热情、关爱和鼓励所淹没。梦想的破灭也许并不是梦想的终结,



市领导、体育局领导看望张亚雯(左三)

我开始怀疑退役的想法是否正确,我发现我的梦想还在,我应该继续战斗。没拿到奥运金牌,我却得到了家乡人民给我的金牌;没能为重庆做到最好,我却被授予重庆的最高荣誉。后面的路,我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也许,等待我的是又一次的梦想破灭,但我仍要拼搏,仍要奋斗,因为我梦想,站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领奖台上,胸前挂着一枚金色的奖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目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当奥运的光环渐渐远去的时候,张亚雯还是用微笑向所有人证明——我的存在,将是一个永久的惊奇。

(责任编辑:周妮)

服务求生存，贡献求发展

——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文王娜

打开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馆主页，整个网站设计简洁明了，褐黄色的模板给人亲切、严谨的感觉。赫然映入眼帘的是浮动的“服务求生存，贡献求发展；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工作做好，不平凡；您的需要就是我的服务，您的满意就是我的微笑。”这些标语是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最初展现给我们的精神风貌。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于1986年4月成立，是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最早的高校档案馆之一。1994年，晋升为全国高校国家一级档案管理单位。档案馆坐落于徐汇校园东首，这座具有传统欧式建筑风格的馆舍是学校的老图书馆，总面积约1280平方米，库房面积约1000平方米。馆藏档案共分6个全宗。馆藏档案14万余卷、照片档案18631张、实物档案1315件。馆藏门类齐全，共17大类，校史资料丰富，建有2000多位知名校友人物档案，完整地保存着自建校以来所有学生的成绩表。

上海交通大学有着百年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学校创始人盛宣怀就十分重视档案，形成了有“盛档”之称的大量档案。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就着手档案信息化建设。在最近的五年里，为适应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需要，构建现代大学发展的信息支撑平台，校档案馆制定了《上海交大数字档案馆》建设方案，先后被纳入了学校“985工程”一、二期建设。档案馆充分吸收国内数字档案馆建设的经验，优化了档案信息服务与管理系统，完善了基础设施、档案鉴定管理平台、网上档案信息集成式服务平台；新建了档案信息网上导入平台、数据交换与集成平台、在线编研陈展平台、档案数字化处理平台、保密及档案数字化原始数据存储管理平台、馆务

精密化管理平台，并对数字档案馆安全保障、数字档案馆建设标准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十余个管理性文件。2008年12月12日，由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网络信息中心和相关信息技术公司联合开发的，学校“985”二期档案文博信息化建设项目《上海交通大学数字档案馆》通过了上海市档案局组织并主持的鉴定。它不仅标志着上海交通大学在数字档案馆建设和应用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在数字档案馆平面化服务向立体化服务的转变历程中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全国高校第一个数字档案馆建设成功。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机构设置及功能也颇有特色。档案馆内设档案业务指导监督室、档案保管利用室、档案史料研究室、信息技术室、展览设计室、校史博物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船舶数字博物馆、钱学森图书馆(筹)六个机构。档案史料研究室成立于1994年，是全国高校档案界第一个档案史料研究室；1996年，建成全国第一个校史博物馆；2002年，建成船舶数字博物馆，成为全国第一座网上虚拟船舶数字博物馆；2003年建成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成为我国高校第一座系统介绍和宣传中华民族走向海洋、走向光辉历史的航运史博物馆；2003年成立的展览设计室也是全国高校档案界第一个；2006年交通大学档案馆在全国高校档案馆第一个申报成功档案学硕士培养点。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档案业务指导监督室兼具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配套归档和网上相关信息导入工作；档案史料研究室兼具档案史料、航运史、船舶史、钱学森研究、档案学硕士点学科建设和在线编研工作；档案展览设计室兼具服务学校陈展和在线陈展设计工作；档案保管利用室以在线服务、在线编研服

务为主、传统服务为辅；校史博物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钱学森图书馆各自兼具实体展馆建设和数字博物馆、图书馆建设。近年来，学校为适应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批准同意校档案馆新设档案文博信息技术室，专事数字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的建设及管理。这就促进了一支由 40 人组成的档案文博创新团队的日益成长和壮大。纵观这一个个勇创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20 年来紧抓机遇、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的奋斗史。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已形成了以档案馆为主体，多馆并存，多学科并举，实体与虚拟相融、研究与探索相结合的档案文博管理体系。其数字档案馆在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 SOA 架构应用、资源整合、网络信息采集和在线编研等方面进行多项创新，为我国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是数字档案馆的生命，也是立馆之本，强馆之基，更是活馆之源。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深化了档案资源体系创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充分利用数字档案馆管理系统这一工作大平台，多渠道地集成档案信息资源、多形式地变革档案信息资源归档模式、多载体地丰富馆藏特色、多层次地学术活动积累馆藏资源、多途径推进馆藏档案数字化、多视角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的依法治档的新办法，为学校、社会的利用服务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基础。截止去年 12 月，全部完成馆藏档案案卷级、文件级著录以及馆藏历史、文书、教学、基建、照片、人物等档案门类的数字化；还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开放了学校 70 年的档案全文信息、现行文件、百年照片档案和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公学院两个全宗档案全文信息，以满足和方便学校对档案利用的需求。

如今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已成为学校档案的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校史研究基地，同时还成为学校和社会建设档案信息服务中心。档案贵在于活，重在于用。以档案数字化成果为支撑，深化档案服务体系创新，上海交大档案馆积极开创了即时性服务、条件性服务、推送性服务、集成性服务、研究性服务和陈展性服务。用新颖的方式开展档案的介绍服务，其网站首页就采用“历史上的今天”来介绍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史，至今已有 2580 条记录，读者只需轻轻点击，就能知道

历史上上海交通大学发生的事情，简单数句，历史犹在眼前，颇具教育意义。在档案馆网站专题推荐中的专题汇编里，甚至还可以查阅到解放前的毕业生照片（解放前-2001 年），均汇编成电子相册，以及解放前的上海交大报，翻阅这些史料，更能激励广大同学珍惜光阴向前辈学习，努力奋斗、顽强拼搏。档案馆还制作了档案文博简报，供用户下载浏览阅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其快速便捷的档案及信息查询功能，档案馆提供查档服务，并制定了详细的《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查档指南》，面向校内外用户开放，而网上开放档案信息的服务则针对校园网用户开展；在上海交通大学数字档案馆的网站上，点击开“档案服务”栏目，下列有档案查询、学历认证、校友人物查询、科技成果查询、文件中心、编研陈展、网上咨询等一系列服务项目；点开档案查询，输入用户登陆后，即可查询到所需要的信息；而校友人物查询服务更具特色，本着为了让更多的人，全面了解这些杰出人物，进而更深刻地认识上海交通大学，把学校优良的办学传统薪传下去，档案馆开发了校友人物信息系统，收集了在上海交通大学（含其前身）学习或工作过的院士，博士生导师，兼职（顾问，名誉）教授，高校领导，企事业界名流，厅局级以上干部等 19 类人物的材料，从这里广大读者就可以方便地了解他们的生平业绩。科研成果查询则为全校师生科研工作的交流开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学历认证则面向广大校友开展学历学位及奖励证书的中英文对照的制作服务工作，用户只需填写网上证书认证申请表，填写资料，上传相关照片，待核查后一周后即可凭证件至档案馆领取。这些无不体现深厚的服务意识。

由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辛成长历程，我们不难体会到其档案团队创新思路、抓紧机遇、服务意识、实干务实的新风气。我们深深的意识到档案建设队伍的业务素质需紧跟时代脉搏、服务学校，而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则是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前提。在此过程中必须建设良好的业务规范，形成干部骨干以身作则、大家齐心协力的良好机制，为学校中心工作，乃至社会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进而开创档案工作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刘广生）

江家駿
曾宛鳳

仁弟：由於受寒，或受熱，自昨晚

起，即覺不適，今日多臥息，未能備課，因此

明晨（星期三）一節外國文學擬請假不上課

你們各位可自己讀書，星期三之英語一定可

以上課（現服薑湯，已見功效）。請通知

沈來清同志，最後請將此紙片交付

並明安之，作為正式向

教務處請病假缺課二小時（而非隨意即不上

課），以重教學紀律。此祝

晚安。

吳宓啟

1963
三月十八晚飯時



1963年3月18日吴宓因病请假假条

（编注：江家駿、曾宛鳳乃吴宓弟子，吴宓尊称其为“仁弟”。）

资料来源：西南大学档案馆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